眞主的追隨者：明武宗及其官窯回回文器皿

翁宇雯
國立故宮博物院
南院處

提　　要

本文以正德官窯回回文器皿的作品為考察重點，以回應過去學界對於正德官窯回回文裝飾現象與明武宗信仰狀況的解讀。

經由耙梳歷史文獻，交叉比對作品之器形、紋飾與小經文款識的內涵，可得知明武宗個人意識透過西北回族宗教文化思想的潛移默化，而誕生這群數量龐大且風格特殊的回回文瓷器。因此，正德官窯回回文作品可說是僅存於明代中期官方伊斯蘭宗教文化的產物，也是帝王品味反映在官窯瓷器上的顯著例子。

關鍵詞：明代官窯、正德官窯、明武宗、伊斯蘭、瓷器、回回文

前　言

明武宗，年號正德，本名朱厚照。弘治四年（1491）九月生，爲明孝宗朱祐樘之長子。出生隔年，朱厚照即被立爲太子，正式具有嗣承大統的身分。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孝宗病重駕崩後，年僅十四歲的朱厚照即位，成爲明代的第十位皇帝。明武宗初上任，即有藩王安化王之亂，在位短短的十六年間（1506-1521），民間竟有三十幾次流民起義，而最後一次正德十四年（1519）寧王朱宸濠之亂，更是翻覆了中國南方的經濟民生。雖然內憂不斷，但明武宗因其生母身份不明等隱憂，[1] 欲以立功方式來證明自己是眾望所歸之皇帝；他甚至不以前朝「土木堡之變」爲誡，試圖出京御駕親征。正德十二年（1517），明武宗自封「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率邊軍赴「應州之戰」，將蒙古兵退走，這是其生平最爲得意一事。明武宗終其一生不乏迎合之小人，然而在豹房內日日與他相處的三大勢力：宦官劉瑾、邊帥首領江彬與錦衣衛軍官錢寧，也在寧王之亂時與朱宸濠勾結；在眾叛親離的惆悵間，武宗於南巡回京途中不慎落水，身染重病。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朱厚照病死於豹房，終年僅三十一歲，葬於康陵，謚號爲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弘文思孝毅皇帝。

正史所記載的明武宗，縱情聲色犬馬、放蕩不羈，是個荒淫無度的風流天子；另一方面，在民間野史故事中，明武宗的形象既被戲曲《遊龍戲鳳》所用，也有研究指出其爲《金瓶梅》主角之一——西門慶的人物原型。[2] 自正德皇帝踐祚之始，在朝政上並無特別建樹，但就陶瓷史研究者的眼光看來，其官窯瓷器種類多元、極富特色，且其中不乏精品，而最令人注目的，即是官窯瓷器中大量出現的回回文器皿。[3] 在明代官窯瓷器上出現回回文雖不是正德官窯首創，[4] 但在正德時期卻突然大量生產，且無論是裝飾手法、描繪部位與文字內容等都呈現了多種多樣的新面貌。

關於回回文爲何在此朝官窯大量出現，學界有以下幾種看法：早在 1940 年

---

1 李洵，〈正德皇帝生母之謎（上）〉，頁 55-59；李洵，〈正德皇帝生母之謎（下）〉，頁 42-44。

2 參見黃強，〈論《金瓶梅》對明武宗的影射〉，頁 49-53；黃強，〈從王東洲墓志銘看《金瓶梅》反映的正德朝史實〉，頁 8-12。

3 本文將阿拉伯文與波斯文通稱為「回回文」，關於回回文在中國境內的發展與演變，請見劉迎勝，〈回族與其他一些西北穆斯林文字形成史初探——從回回字到「小經」文字〉，頁 5-13。

4 就筆者目前蒐集的資料中，正德朝以前明代官窯中出現回回文紋飾者有：〈永樂青花瓷波斯文小洗〉十件（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永樂青花阿拉伯文無擋尊〉（北京故宮博物院、天津藝術博物館與大英博物館各藏一件）、〈成化阿拉伯文香爐〉（馬來西亞國家博物館藏）、〈弘治青花阿拉伯文盤〉（科威特博物館藏）等。

代，這群裝飾特殊的品類即已受到論者注意。首先，Basil Gray 觀察到這群作品的器形：如盤、碗、爐、罐等，皆是傳統以來在中國境內已持續使用之物，再結合 Berthold Laufer 的意見，[5] 推論這些作品是爲迎合中國穆斯林宦官所好而製作。[6] 1954 年，Harry Garner 也主張這些瓷器上的回回文字與身爲伊斯蘭教徒的宦官有關。[7] 隨著這些論見，當 1986 年 Regina Krahl 介紹土耳其砲門宮收藏的中國瓷器時，同樣認爲在宮廷內把持權力的宦官促成了這批瓷器的誕生。[8] 而 John Carswell 亦持此見，並舉 1945 年 John Pope 在北京曾發現帶有阿拉伯文的青花碗破片爲立論依據，強調這些作品既然在中國消費流通，即非爲輸往伊斯蘭世界而製作。[9] 宦官影響這批作品誕生的論點，往後亦有 Jessica Harrison-Hall 等人跟隨。[10]

然而，正式以專文討論此一議題，並詳細分析宦官具體介入官窯操作的狀況，則是近年日本佐藤莎拉的研究。佐藤氏運用大量文獻，強調宦官掌管宮廷御用樣式，並且經常擔任景德鎮官窯督陶官，推論這些作品確是正德年間穆斯林宦官專制政治下的產物。[11] 此外，在佐藤莎拉考察成化朝鬥彩「天」字銘罐所見龍紋的另一專文中，討論其與宦官及西藏喇嘛僧侶的關係，也可見她始終力持宦官品味主導官窯樣式的論點。[12]

在學界對該議題一面倒的趨勢下，李毅華與趙宏則分別撰文討論，認爲正德官窯回回文瓷器其實與皇帝朱厚照的穆斯林身份有關。[13] 陳玉秀則進一步驗證正德描紅回文盤與青花作品的器面文字，並結合文獻，認爲其中可見明武宗具有伊斯蘭教支派蘇非 (Sufi) 思想的證據。[14] 另有意見認爲，正德官窯飾有回回文的作品其實是

---

5 Berthold Laufer, “Chinese Muhammedan Bronze,” pp. 132-147.

6 Basil Gray, “The Influence of Near Eastern Metalwork on Chinese Ceramics,” pp. 58-59.

7 Sir Harry Garner, *Oriental Blue And White*, pp. 28-31; Sir Harry Garner, “Some Notes on the Chinese Blue and White Exhibition,” p. 55.

8 Regina Krahl, edited by John Ayers,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A Complete Catalogue Ⅱ Yuan and Ming Dynasty*, pp. 534-536.

9 John Carswell, *Blue and White:Chinese Porcelain Around the World*, pp. 138-141.

10 Jessica Harrison-Hall, *Ming Ceramics in the British Museum*, p. 188, p. 190.

11 佐藤サアラ，〈正德アラビア文字裝飾青花に關する一考察—その生產背景と景德鎮窯業における位置－〉，頁 65-98。

12 佐藤サアラ，〈明代官窯における成化鬪彩の位置—「天」字銘罐上に見られる龍文樣からの考察－〉，頁 47-63。

13 李毅華，〈兩件正德朝回回文瓷器——兼談伊斯蘭文化的影響〉，頁 49-51；趙宏，〈明正德青花瓷器及有關問題〉，頁 26-30、60。

14 陳玉秀，〈以紋識意——從阿拉伯文紋飾談正德時期伊斯蘭教的意涵〉，頁 78-91。

爲了外銷伊斯蘭地區而製作。[15] 然而，今日所見飾以回回文的正德官窯作品，諸如爐、瓶與筆架等器形，幾乎都是中國傳統使用之器，反而不若明初常見的外觀仿似中近東金屬器或玻璃器的官窯瓷器，因此這個推論還有待進一步的檢驗。此外，鄭德坤提出明武宗崇尚伊斯蘭信仰，這些「回回花瓷器」是爲供應宮廷中國穆斯林所使用，而其中有部份則是做爲禮物餽贈伊斯蘭國家的統治者。可惜鄭德坤並未敘述其推論理由，也未明確指出針對兩種不同用途是否能就作品外觀造形直接區別。[16] 駱愛麗則探討十五、十六世紀明代回回人遺留的重要文物——明永樂朝《噶瑪巴爲明太祖薦福圖》與「正德朝礬紅回回文瓷器」（即本文〈明正德描紅回文盤〉），認爲兩者皆是未受漢化影響、最具伊斯蘭本質的「原始風貌的作品」，文中也談及正德朝青花瓷器上的回回文裝飾，並提到明武宗與伊斯蘭教的關係。[17] 近兩年則有劉偉研究正德時期受伊斯蘭文化影響的宮廷瓷器，認爲這批文物是具有反骨性格的武宗因藐視宮廷戒律所燒造出的新奇產品。[18]

然而，過去學界較少正視回回文瓷器本身所留下的線索，原因是大多無法解讀器表上的回回文意義，也往往忽略回回文瓷器的器形本身與伊斯蘭教儀式的關聯。此外，正德官窯回回文器皿中的少數作品，甚至有別以往由漢字書寫款識的傳統，而是以回回文書寫代表官方所有權的底部款識，也是啓人疑竇之處。況且，不論是官方史料《明史》或《明實錄》，皆載明武宗與藏傳佛教的緊密聯繫，[19] 無法對官窯中所顯現的伊斯蘭風情有所解釋。因此，本文欲先從明武宗時期的官窯回回文器皿做爲考察重點，嘗試全面釋讀目前所見回回文器皿的內容，補充以往傳統史學資料，並提出回回文器皿之器形及回回文款識與伊斯蘭教的關聯。在爲正德官窯回回文器皿的文字解碼後，筆者將配合文獻中記載的明武宗之生平與信仰觀，嘗試探索明武宗介入官窯品味的動機與方式，藉此也回應以往學界對於正德官窯回回文裝飾現象的解讀。

---

15 谷口閱次，〈成化・弘治・正德窯〉，頁 212；長谷部樂爾，〈成化、弘治、正德の官窯磁器〉，頁 194；孫錦泉，〈華瓷運銷歐洲的途徑、方式及其特徵〉，頁 94；陳擎光，〈從宗教性紋飾探討十七至十八世紀中國貿易瓷供需之問題〉，頁 273-296。

16 Cheng Te-K'un, "Studies in Chinese Ceramics," pp. 82-97.

17 駱愛麗，《十五—十六世紀的回回文與中國伊斯蘭教文化研究》。

18 劉偉，〈正德時期受伊斯蘭文化影響的宮廷瓷器〉，頁 86-101；劉偉，《帝王與宮廷瓷器（上）》，頁 204-217。

19 關於史料中對明武宗與藏傳佛教關係之敘述，請見楊啟樵，《明清皇室與方術》，頁 68-74。

一、正德官窯中的回回文瓷器

若欲瞭解明武宗其人生平與信仰觀，除了史料中所提供的線索，從其當朝藝術作品也許還可見端倪。以官窯瓷器爲例，明人王宗沐《江西大志．陶書》〈建置〉篇中則載：「正德初，置御器廠，專管御器。先是兵興，議寢陶息民，至是復置。」[20] 藉此可知，正德朝時景德鎮御窯廠又得到了恢復與發展。關於以往學界對正德官窯瓷器的研究，日本與中國學者普遍就風格類型相近爲由，將正德官窯瓷器納入「成化、弘治、正德」這一脈絡當中，[21] 而各時期之下，又可細分不同官窯之差異。事實上，各時期間的分隔並非絕然斷裂，仍具有某種連續性，只是分期點往往標幟某些新品種的出現或成熟；不過作爲考察明代官窯之整體風格與演變趨勢，即使今日看來，此分期觀仍不失爲一個權宜性的作法。關於「正德官窯」的專論則極少見，要瞭解正德作品的面貌，反而只能在通論性書籍提及明代官窯部分覓得。現今可見的正德官窯瓷器就來源可分爲兩大類，一是傳世品，即博物館以及私人收藏，[22] 其中主要藏地是國立故宮博物院與北京故宮博物院；第二類是出土物，主要爲近年景德鎮珠山窯址挖掘之新發現。[23]

一直以來，中國工藝美術品上作爲裝飾用的回回文之實例零星可數。以明代官

---

20 王宗沐，《江西大志．陶書》，收入李科友、吳水存，《古瓷鑑定指南》，頁 143。

21 長期以來，有關明代陶瓷分期觀點（洪武，永樂、宣德，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慶、萬曆，天啟、崇禎）大同小異。試舉一、二如下：1961 年，尾崎洵盛將明代景德鎮窯業區分為三期：第一期為「洪武至天順」，第二期為「成化至正德」，第三期為「嘉靖至明末崇禎」，全書的文章編排則是「明初（洪武至天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慶、萬曆」，「明末」；1975 年，藤岡了一一文，區分出「洪武青花」、「永樂．宣德青花」、「暗黑時代青花」、「成化．弘治．正德青花」、「嘉靖．隆慶．萬曆青花」、「明末青花」；1976 年小學館出版《世界陶磁全集》第十四卷 明，文章編排次第同前述尾崎洵盛一文；1993 年，耿寶昌在《明清瓷器鑑定》一書則分成「洪武．建文」、「永樂．洪熙．宣德」、「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慶．萬曆」、「泰昌．天啟．崇禎」幾個時期討論。文見尾崎洵盛，〈元．明陶磁の概觀〉，頁 169-180；藤岡了一，《陶磁大系 第四二卷 明の染付》；相賀徹夫編輯，《世界陶磁全集》第十四卷 明，頁 187-194；耿寶昌，《明清瓷器鑑定》。

22 另土耳其砲門宮（Topkapi Saray Museum）與雅加達國立中央博物館（Museum Pusat Nasional）分別藏有兩件青花碗與一件〈青花鳳凰缽〉，款為「大明正德年造」，筆者視為民窯作品，不列入本文所論之「正德官窯」作品群範圍。圖版見 Regina Krahl, edited by John Ayers,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p. 565, pl. 772 與 p. 583, pl.789; Abu Ridho, *Oriental Ceramics, v. 3. Museum Pusat, Jakarta*, pl. 176。

23 見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及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景德鎮出土五代至清初瓷展》；炎黃藝術館編，《景德鎮出土元明官窯瓷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江西景德鎮明清御窯遺址發掘簡報〉，頁 4-47。至於文物拍賣圖錄，則因真偽難辨等種種因素，原則上不在蒐羅之列；同時因文物拍賣圖錄中標示正德朝作品之品類與造形，絕大多數與博物館所藏者重複，也無影響本文結論之虞。

窯爲例，回回文爲飾始見於永樂朝，[24] 之後成化、弘治、嘉靖偶見此類傳世品。[25] 較之以往，正德官窯中出現的回回文紋飾器皿數量遽增，[26] 經由統計現存實物，目前蒐羅正德官窯瓷器中裝飾有回回文的作品共計六十八件（參見附錄）。以下將針對正德朝瓷器中施有回回文紋飾者進行觀察，並就其表現形式及文字內容、器形與款識等進行討論，分節敘述於後。

（一）回回文器皿的表現形式及其內容

在正德官窯瓷器中所見回回文裝飾現象，分別就「文字施作部位」、「文字佈局」、「使用文字」、「文字內容」與「書寫技巧」五方面進行觀察，可以明顯發現其中「青花器」與「紅彩器」兩種品類風格迥異。

1. 文字施作部位

觀察正德官窯回回文器皿可知，正德官窯青花瓷器上帶回回文紋飾者，其文字絕大部分皆置於開光當中，而且這些開光的形式皆是圓形、菱形、正方形等幾何圖案的組合與衍伸，並伴隨中國纏枝花葉或雲頭紋的元素於開光結構中。雖然以開光

24 參見註 4。

25 根據目前所見資料，正德朝之後官窯瓷器帶有回回文字裝飾者，至少有嘉靖〈阿拉伯文青花蓋硯〉（中國首都博物館與日本私人藏各乙件），但詳細情形，見後文進一步說明。

26 據《故宮瓷器錄》所載，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正德官窯作品計有七百件，其中〈正德窯甜白牡丹花式洗〉十二件、〈正德窯甜白龍紋盌〉二件、〈正德窯甜白大盌〉二件、〈正德窯甜白盌〉三件、〈正德窯甜白龍紋盤〉三件、〈正德窯甜白碟〉二件、〈正德窯祭紅白裏盌〉二件、〈正德窯祭紅白魚盌〉四件、〈正德窯祭紅白魚盤〉六件、〈正德窯祭紅白裏盤〉五件、〈正德窯霽青白花果盤〉七件、〈正德窯嬌黃盌〉三十七件、〈正德窯嬌黃盤〉八十六件、〈正德窯青花波斯文番蓮尊〉一件、〈正德窯青花波斯文番蓮七孔花插〉一件、〈正德窯青花波斯文梅花圓罐〉一件、〈正德窯青花龍紋渣斗〉十三件、〈正德窯青花牡丹大盌〉一件、〈正德窯青花雲龍盌〉二件、〈正德窯青花雙龍戲珠盌〉二件、〈正德窯青花五龍盌〉七件、〈正德窯青花蓮花盌〉四件、〈正德窯青花雙龍盌〉一件、〈正德窯青花番蓮盌〉一件、〈正德窯青花花卉盌〉一件、〈正德窯青花五龍仰鐘式盌〉一件、〈正德窯青花五龍高足盌〉八件、〈正德窯青花雙龍戲珠盤〉十六件、〈正德窯青花五龍盤〉三十九件、〈正德窯青花波斯文蓮花盤〉四件、〈正德窯青花靈芝盤〉四件、〈正德窯青花番蓮盤〉二件、〈正德窯黃釉青花花果盤〉四十一件、〈正德窯釉裏紅三果梧〉二件、〈正德窯釉裏紅梵文盤〉二件、〈正德窯釉裏紅四魚盤〉三件、〈正德窯抹紅波斯文盤〉一件、〈正德窯抹紅靈芝盤〉四件、〈正德窯抹紅花果盤〉三件、〈正德窯紫金釉花果盤〉八件、〈正德窯綠彩龍紋盌〉五十一件、〈正德窯綠彩龍紋盤〉一百五十五件、〈正德窯嬌黃綠彩雙龍戲珠渣斗〉二件、〈正德窯嬌黃綠彩雙龍仰鐘式碗〉二十九件、〈正德窯嬌黃綠彩雙龍戲珠盌〉二件、〈正德窯嬌黃綠彩花卉高足盌〉五件、〈正德窯嬌黃綠彩雙龍壽字鐘〉二件、〈正德窯嬌黃綠彩雙龍戲珠盤〉六十八件、〈正德窯青花綠彩五龍盌〉十八件、〈正德窯青花雙龍紅雲盌〉八件、〈正德窯青花紅綠彩雙龍戲珠高足盌〉八件、〈正德窯藍地三彩番蓮花盆〉一件、〈正德窯三彩花果盤〉三件、〈正德窯五彩魚藻盤〉四件。除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還有許多已刊載或未揭示的博物館或私人收藏，所以實際上正德官窯飾有回回文之作品數量與正德官窯所有作品之比例，其「分母」數應遠比想像中的多。見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編輯，《故宮瓷器錄》第二輯 明乙 上編，頁 32-79。

爲飾在伊斯蘭世界的造形藝術不勝枚舉，但在中國官窯瓷器器表繪以複雜多樣的幾何形式開光，再結合回回文字於內，很可能是正德官窯的創舉。其開光形式之簡易版僅以單線畫圓，例如北京故宮博物院所收藏訂名爲〈青花阿拉伯文燭臺〉（圖 1，附錄 35）者，[27] 也有較爲複雜者，如本院所藏〈青花阿拉伯文番蓮尊〉（圖 2，附錄 36），器身中央四面各以菱形內接方框，四角內分飾雲頭紋；另有在同一器上結合多種開光形式者，例如〈青花阿拉伯文蓋硯〉（圖 3，附錄 23，法國吉美博物館藏），蓋面以複線菱形內方框飾雲頭紋及複線雙圓爲飾，器身則以複線圓形與菱形開光交錯，各開光內飾回回文字。

正德官窯雖有文字不寫在開光內，而直接填塞於器壁主紋飾之空白處的例子，但是爲數甚稀；如圖 4〈青花阿拉伯文碗〉（附錄 40，北京故宮博物院）與圖 5〈青花波斯文蓮花盤〉外壁（附錄 47-51，國立故宮博物院與北京故宮博物院），兩類作品均帶有「大明正德年製」款識，且器壁纏枝花葉的風格與其它作品一致，因此可以和這群幾何圖形開光內裝飾回回文字的作品歸納爲同一群。

相對於上述青花作品群複雜又多樣的開光形式，正德官窯作品群中有八件描紅回文盤，[28] 除在白釉瓷盤上繪以複線圓圈，其內書紅彩文字，並無其它紋飾，因器面佈局相當簡略而顯得極爲特殊。八件描紅回文盤作品中，有五件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圖 6-10，附錄 61-65），一件爲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品（圖 11，附錄 66），另兩件則分別爲上海博物館（圖 12，附錄 67）與科威特博物館（圖 13，附錄 68）所藏。儘管文字內容略有差異，八件作品的裝飾形式完全相同：盤心以同一圓心作一大一小複線畫成的圓圈；盤壁外側則直接書寫文字；盤底則與其它官窯款識相同，以複線畫圓內書款識。

2. 文字佈局

正德官窯瓷器飾有回回文的青花作品，除了文字多書寫於開光內，依據書寫

---

27 原品名為〈青花阿拉伯文燭臺〉，見耿寶昌主編，《青花釉裡紅》（中），頁 61，圖 56。然所飾文字均為波斯文，宜正名之。

28 另有一帶回回文款的黃釉盤殘片，出於草千里編，《中國歷代陶瓷款識》上冊，頁 111。駱愛麗早先提出草千里誤認為「弘治外文款」，事實上款識為小經文字「大明正德年製」。該書並未標示此件黃釉盤收藏於何處，也無法從圖片直接辨認其真偽，故不納入本文討論。另駱文提出尚有兩件罐器，但該罐器皆為文物拍賣公司所示，僅從圖片無法確知真偽，且罐器無款，不知是否為正德時物，因此筆者不列入本文討論。見駱愛麗，〈中亞穆斯林後裔在中國活動初探——以正德朝兩件礬紅回回文瓷器為基礎〉，頁 10；駱愛麗，《十五—十六世紀的回回文與中國伊斯蘭教文化研究》，頁 208-214、216。

內容長短而以開光擷取其「字」、「詞」、「句」的佈局形式也獨具特色。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青花阿拉伯文梅花圓罐〉（圖 14，附錄 38），[29] 器身四面分置開光，四個開光內分別書寫四個阿拉伯文單字：「صاحب」（「陪伴」）、「الخيار」（「好人」，複數形）、「تامن」（「小心」；「防避」）、「الاشرار」（「壞人」，複數形），四字可連讀爲：「صاحب الخيار تامن الاشرار」，合譯爲「親賢人、遠小人」；另外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的〈青花阿拉伯文盤〉（圖 15，附錄 52），盤心中央開光置複合名詞「قال نبى」（「先知」＋「說」），盤壁的六個開光內文字按順時鐘排列依序是：「رحم الله」（「阿拉」＋「憐憫」或「饒恕」）、「عبدا」（「僕人…」〈接姓名〉）、「قال」（「說」）、「فغنم」（「因此」＋「得到好處」）、「او صمت」（「或者」＋「沈默」）、「فسلم」（「因此」＋「取得安全」），可合寫爲：「قال نبى ، رحم الله عبدا قال فغنم او صمت فسلم」，漢譯爲：「先知說：『阿拉憐憫他的僕人，開口即得到好處，沈默則取得安全。』」除了以開光擷取單字與詞句，也有將完整句子納入開光的例子，如德黑蘭考古博物館收藏的〈青花阿拉伯文大盤〉（圖 16，附錄 54），盤心中央四瓣開光內寫著阿拉伯文：「الشكر على نعمائه」，譯爲「感謝他（阿拉）的恩惠」。從回回文器之文字佈局、盤心與盤壁周圍文字皆有所呼應等特徵，顯現製作這些作品時應是遵循一文字佈局的稿本，而非工匠隨意擷取回回文字進行拼貼。

此外，八件描紅回文盤的文字佈局形式幾乎雷同：盤壁以順時鐘或逆時鐘方向書寫四至五個句子，並以空格斷開各句；盤心部分置有兩個複線同心圓，內圓置一個整句；外圓則在四方平均各書一單詞，盤心四方的單字爲字字分離，朝圓內正向或垂直書寫以「上下右左」（圖 7-b，附錄 62）或「上右下左」（圖 12-b，附錄 67）、「上右左下」（圖 9-b、10-b，附錄 64-65）、「右下左上」（圖 8-b，附錄 63）等四種順序形式連讀成句。盤心內圓中的文字佈局設計則有兩種不同形式；一種是在複線圓圈內將文句拆成三行，如分別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圖 7-b，附錄 62）與北京故宮博物院（圖 11-b，附錄 66）的兩件描紅回文盤，這兩件作品在盤心部分佈局完全相同，可以拆爲：第一行「ولا تبسطها كل」、第二行「البسط فتقعد ملوما」、第三行「محسورا」，三行連讀爲「ولا تبسطها كل البسط فتقعد ملوما محسورا」，文意出自《古蘭經》十七章二十九句的後半句：「也不要把手完全伸開，以免你變成悔恨的受責備者。」[30]

29 此件作品原標示〈青花波斯文梅花圓罐〉，見於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編輯，《故宮瓷器錄》第二輯 明乙 上編，頁 44；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藏瓷 明青花瓷四》，頁 49。然所飾文字與內容均為阿拉伯文，宜正名之。

30 漢譯引自《中文譯解古蘭經》。以往亦有學者所譯釋文，與筆者略有些微差異，請見陳玉秀，〈以紋識意——從阿拉伯文紋飾談正德時期伊斯蘭教的意涵〉，頁 82。

此外分別收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圖 9-b、10-b，附錄 64-65）與上海博物館（圖 12-b，附錄 67）及科威特博物館（圖 13-b，附錄 68）的描紅回文盤，盤心置中複線圓形內則如同阿拉伯書法藝術中字母交錯配置的書寫形式，填入完整句子。

3. 使用文字

正德官窯中書寫有回回文的青花器皿，依據使用文字可分爲三類：波斯文、阿拉伯文、以及同一器上波斯文與阿拉伯文並存的作品，[31] 且大多可辨讀其意義。如收藏於雅典貝納基（Benaki）博物館與香港天民樓的〈青花波斯文三足香爐〉（圖 17，附錄 12），器身的六個弧面中各置有一複線四瓣花形開光，其內各容一波斯文單詞，分別是「آنکه با عطّار」（「哪個人」＋「跟」＋「賣香水的人」）、「می گردد」（會變成）、「تربیت」（教養、教育）、「اوهمی باید」（「他」＋「一直」＋「必然、一定」）、「زبوی خود」（從他自己的味道）、「نصیب」（「有了分配」或「一部份」），合寫爲：「آنکه با عطّار می گردد تربت او همی باید زبوی خود نصیب」，漢譯爲：「誰如果受到賣香水的人的教化，他必然會沾染到他的味道」，此句類似中國成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另有〈青花阿拉伯文三足香爐〉（圖 18，附錄 13，大英博物館藏），器身也有六個複線圓形開光，內中寫有阿拉伯文語彙，分別爲：「انا الحنان」（「我」＋「仁慈的」）、「فاطلبنی」（「所以」＋「來尋找我」）、「تجدنی」（你會找到我）、「صلی الیّ」（讚美我）、「لا تقصد」（「不要」＋「尋靠」或「尋求」）、「سوایی」（除了我以外），文字連讀成：「انا الحنان فاطلبنی تجدنی ، صلی الیّ لا تقصد سواییز」，漢譯「我是仁慈的，所以尋找我就尋見，除我以外不能渴慕他人。」

波斯文與阿拉伯文並存於一器的例子，則可見於〈青花阿拉伯文圓盒〉（圖 19-20，附錄 30-31，北京故宮博物院與大英博物館皆藏類似作品），蓋上圓形開光內書寫阿拉伯文句子：「والشفقة على خلق الله」，意爲「（並）憐憫阿拉的創造」。而器蓋側面的八個開光文字則是波斯文，分別寫成「ای」（「噢」，感嘆詞）、「سامع」（聽者）、「قالات」（「陳述」、「聲明」）、「من」（我的）、「بنگر」（「留心」、「注意」）、「كنون」

31 阿拉伯語與波斯語都是伊斯蘭世界廣泛通行的語言，但分屬不同語系，但字母寫法卻相互借用。阿拉伯語屬閃含語系閃語族裡的南部閃語支，主要使用於西亞、北非、東非地區，字母有二十八個，阿拉伯語同時也是下列國家的官方語言：沙烏地阿拉伯、葉門、南葉門、阿曼、科威特、巴林、卡塔爾、伊拉克、敘利亞、約旦、黎巴嫩、埃及、蘇丹、利比亞、突尼斯、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使用阿拉伯語為母語的有一億一千多萬人左右。此外，在其它國家中，還有數百萬穆斯林也略懂阿拉伯語，因為它是伊斯蘭教和神聖《古蘭經》的語言。波斯語則是印歐語系中伊朗語族裡的波斯語，主要於伊朗、阿富汗被使用，字母有三十二個。詳見袁義芬，〈阿拉伯文與波斯文形貌之比較〉，頁 72-74。

（現在）、「حالات」（「狀況」、「行爲」複數形態）、「من」（我的），合譯爲：「噢！那些聽我話的人，現在要來看（而學習）我的表現。」圓盒器身側面的六個開光文字也是波斯文，各爲：「ای خدای」（「噢」＋「神」）、「بنمای」（顯現）、「ببندگان」（「對」＋「僕人」）、「روی راحت」（「面」或「狀況」＋「舒適」或「幸福」）、「تو خدای」（「你」＋「神」）、「که جز نیست」（「就」或「那麼」＋「其他」＋「不是」或「沒有」），今譯爲：「噢，神啊！向你的僕人顯現寧靜、輕鬆、無憂的一面，別無他神唯有你是神。」

八件描紅回文盤除款識部分另在後文討論，盤上其餘部分的書寫文字亦與青花作品情況相同，有阿拉伯文與波斯文，也有兩者交雜的形式。如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描紅回文盤（圖 8-a、8-b，附錄 63），其盤心與盤壁文字均爲波斯文，上海博物館（圖 12-a、12-b，附錄 67）所藏作品雖然盤心皆書寫阿拉伯文，但盤壁文字有四段，以款識正向觀看之左側與右側文字內容相同，都是以波斯文書寫「راست گفت خدای تعالی بزرگ」，而其上端與下端則以阿拉伯文寫：「صدق الله العظيم」，兩段話雖使用不同文字表示，但意義完全相同，皆譯爲：「偉大阿拉所說的話是真理」。除此之外，其餘六件作品的盤心與盤壁文字皆由阿拉伯語寫成。

4. 文字內容

在正德官窯青花瓷器上書寫的回回文字除了具有裝飾作用，大多也可辨讀其意義。筆者所見正德官窯青花回回文器，其書寫內容大致分爲六類：

(1)《古蘭經》經文：

正德官窯青花作品的書寫內容中，以歌頌及感謝真主阿拉的字句最多。其中有擷取《古蘭經》經文者；如英國大衛德基金會舊藏，現由大英博物館保管的〈青花回字文硯屏〉（圖 21，附錄 10）在一開光中完整寫入《古蘭經》第七十二章的第十八、十九、二十句：「一切清真寺的，都是真主的，故你們應當祈禱真主，不要祈禱任何物。當真主的僕人起來祈禱他的時候，他們幾乎群起而攻之。你說：『我只祈禱我的主，我不以任何物配他。』」[32]

(2) 真主阿拉的尊名：

英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的〈青花阿拉伯文長頸瓶〉（圖 22，附錄 17）其器頸上的圓形開光內爲阿拉伯文：「الجليل」，意思是「非常有光輝的」；[33] 伊斯蘭教義

32 《中文譯解古蘭經》，頁 573。
33 《中文譯解古蘭經》，頁 604。

學家曾匯集《古蘭經》中所有描述真主阿拉的文句，歸納成「真主阿拉的九十九個尊名」。[34] 而「非常有光輝的」即包含其中。

(3) 歌頌、感謝真主阿拉的詞句：

如前述收藏在德黑蘭考古博物館的〈青花阿拉伯文大盤〉（圖 16，附錄 54）盤心寫有「感謝他（阿拉）的恩惠」，而華盛頓佛利爾美術館所藏〈青花阿拉伯文碗〉（圖 23，附錄 43），其碗心寫有「الشكر بنعمته」，即「感謝他（阿拉）的恩典」；近年景德鎮明清御窯廠正德地層出土之〈青花方盆殘片〉（圖 24，附錄 58），雖然有所殘破，但仍能辨識出盆心開光內書寫著阿拉伯文：「الشكر على الطاف كرمه」，漢譯爲：「感謝他（阿拉）慷慨的恩慈」。

(4) 清真言與禱告詞：

明代中期清真寺的碑文上即寫有：「其教人之要，則有五焉，所謂誠、禮、齋、濟、游是已。」[35] 指示虔誠的穆斯林必須謹守五功：「念、禮、齋、課、朝」；其中「念」就是念「清真言」：「萬物非主，唯有阿拉；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使者。」（لا اله الا الله محمدرسول الله），這是穆斯林的信仰告白，[36] 而「清真言」在正德官窯青花作品中亦有出現。現藏於土耳其砲門宮的〈青花文字紋碗〉（圖 25，附錄 44）其碗心中央多瓣形開光內有一波斯文字「نعمت」，譯爲「恩惠」，圍繞此一單詞，則有四條呈輻射狀等距發散的文字，內容相同，都是「清真言」；而珠山遺址正德地層發現的〈青花欄板殘片〉（圖 26，附錄 60），雖其書寫文字大半佚失，但仍可推測開光書寫的內容是「清真言」的一部分。此外，正德官窯回回文青花瓷器中，有些文字內容具有禱告的性質，如前述〈青花阿拉伯文圓盒〉的文字內容即是穆斯林向阿拉尋求的禱告詞；另外也有將真主阿拉擬人化、以阿拉爲第一人稱的書寫內容；例如大英博物館的〈青花波斯文方瓶〉（圖 27，附錄 16），其中的兩開光文字合寫爲：「فاطلنى تجدنى」，可漢譯爲「因此尋找我必尋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的〈青花阿拉伯文番蓮尊〉（圖 2，附錄 36），器身兩面開光分別書寫：「الهم احفظ ولاته」與「و ذمّ اعدايه」，

34 伊斯蘭教義學家歸納阿拉有九十九個尊名（美名），加上「阿拉」，共有一百個尊名。這些尊名都是美好的詞彙，如創造者、萬能者、完美者、聖潔者、睿智者等等。見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蘭研究室編、秦惠彬主編，《中國伊斯蘭教基礎知識》，頁 118。

35 「誠」即「念功」、「濟」即「課功」、「游」即「朝功」，文見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蘭研究室編、秦惠彬主編，《中國伊斯蘭教基礎知識》，頁 124-125。

36 穆斯林的「念功」，就是一個成年人、智力健全者對信仰宗教表白，心口合一誦讀「清真言」，這句話貫穿在穆斯林生活的各個方面，如穆斯林嬰兒起「經名」時、證婚時、宣禮時，禮拜祈禱時以及病危時都能夠聽到這句話。見丁明仁，《伊斯蘭文化在中國》，頁 125。

合譯爲：「（阿拉）保佑他的朋友們，責備他的敵人們。」

(5) 器形用途：

例如〈青花波斯文筆架〉（圖 28，附錄 1-7），窯匠在器身兩側分別以波斯文書寫「خامة」及「دان」兩個單字，兩者組合即成「筆的位置」，即「筆架」，恰恰標示了此器的用途。

(6) 格言諺語：

本院典藏的〈青花波斯文蓮花盤〉（圖 5，附錄 48），盤壁十個波斯文字並未以開光分隔，但連讀成：「در نزهّ حلق خود را پاک دار از مر مزهّ تا نیفتی در وبال」，可直譯爲：「在犯罪的部分，從每一種不同的味道把你的喉嚨保留乾淨，才不會碰到麻煩。」意譯爲：「不要靠近任何犯罪，才不會遇到問題。」

綜合以上各種分析，在正德官窯青花瓷器上所出現的文字內容除了少數標示器形用途者與格言諺語外，其餘幾乎都環繞著伊斯蘭教教義，也隱約透露這些作品不只單純是裝飾異國文字的趣味，也有與伊斯蘭教及其文化的關聯性。

然而，儘管正德官窯八件〈描紅回文盤〉外形與尺寸皆同，但書寫內容幾乎不相重複，其也有如上述青花瓷器所見，有書寫《古蘭經》（附錄 61、62、64、65、66、67）、對真主阿拉的感謝與祈求（附錄 65、68）的例子。較特別之處是其中有書寫賢哲名言的，例如科威特博物館收藏的〈描紅回文盤〉（圖 13-a，附錄 68），其盤壁書寫文字數量居於八件之冠，以盤底正向觀看，由款識正上方依逆時針方向寫爲五句：

「قالرسول الله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阿拉會讚美他、說他好話的使者（先知）說，」

「راحت الجسم فى قلت الطعام」=「少吃飯你的身體就會舒服。」

「و راحت السان فى قلت الكلام」=「少講話你的舌頭就會舒服。」

「و راحت القلب فى قلت الاهمام」=「少憂煩你的精神就會舒服。」

「و راحت الروح فى قلت الاثام」=「少犯罪你的心靈就會舒服。」

內容是阿拉伯學者 Thabit Bin Qara(836-901) 的名言，[37] 此外，還有書寫吉祥話的例

37 John Carswell 與 Oliver Watson 皆表示此段話出於《聖訓》，但未指明出自《聖訓》中之何處。文見 John Carswell, *Blue and White: Chinese Porcelain Around the World*, p. 125; Oliver

子，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描紅回文盤〉（圖 8，附錄 63）盤心中雙圈內文字是波斯文：「الابتدا همايون ، الانتها ميمون」，譯爲「一開始很光輝，結束也很祝福（帶來好運）」。[38] 圍繞盤心四周的文字與盤心內只是書寫形式不同，內容完全相同，並有吉祥的寓意。同件〈描紅回文盤〉的盤壁寫有：「اى كريمى كه از خزانه غيب ، گبر وترسا وظيف خور دارى」，以及「نظر دارى دوستان را كجا كنى محروم ، تو كه با دشمنان چنين」，漢譯：「啊！你這個慷慨的人，從眼目不能見的神聖寶庫，就連那些不信你的祆教和基督徒，你都餵養他們。既然你對你的敵人們好，怎麼可能會讓你的朋友受剝奪呢？」[39] 這是出於伊朗詩人薩迪 (Moshlefoddin Mosaleh Sa'di, 1208-1292)《古洛斯坦》一書前言部分。[40] 薩迪在蒙古人入侵伊朗、建伊兒汗國期間四處旅行，也曾遊歷新疆一帶。[41]《古洛斯坦》則被列爲西北穆斯林經堂教育中「十三本經」之一，[42] 內容寓伊斯蘭思想於文字形式中，大多都是訓誨體的故事。[43]

5. 書寫技巧

在正德青花瓷上所見回回文字句，幾乎都是以一般書寫字體混合標音符號，但大部分瓷器上的文字形態相當生硬。考慮到阿拉伯人或波斯人原以蘆葦管斜削成硬

Watson, *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Kuwait National Museum*, p. 490. 筆者查詢《聖訓》版本為坎斯坦勒拉尼註釋，（埃及）穆斯塔發・本・穆罕默德艾瑪熱編，穆薩・寶文安哈吉、買買提・賽來哈吉譯，《布哈里聖訓實錄精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但未能尋獲；承蒙顧朋先生協助筆者在網路搜尋得知，這段話來自阿拉伯學者 Thabit Bin Qara（生卒年回曆 211 或 221-288），筆者方知此語由來，在此謹申謝忱。關於 Thabit Bin Qara 資料見：http://muslimscience.8m.com/olma/80.htm（檢索時間 2008/2/10）。另外駱愛麗對此件作品也有譯文，見駱愛麗，《十五—十六世紀的回回文與中國伊斯蘭教文化研究》，頁 201-202。

38 駱愛麗認為其文字並非出自《古蘭經》經文或是《聖訓》，而是純粹的波斯文表述語句，或可漢譯為「始於幸福，終於吉慶」，或可引申為穆斯林「兩世吉慶」的波斯文說法。「兩世吉慶」的觀念與實踐屬於伊斯蘭教的道德規範，為此提出從善去惡的理論學說與倫理道德準則。見駱愛麗，〈中亞穆斯林後裔在中國活動初探——以正德朝兩件礬紅回回文瓷器為基礎〉，頁 6。

39 另有其它關於此段文字的譯文，文見（波斯）薩迪著、楊萬寶譯，《真境花園全譯》，頁 2；薩迪著、張鴻年譯，《薔薇園》，頁 2；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藏瓷 明彩瓷二》，頁 36；駱愛麗，《十五—十六世紀的回回文與中國伊斯蘭教文化研究》，頁 171-183。

40 薩迪所著《古洛斯坦》，此書名是波斯文漢文音譯，另外漢譯本名稱有兩種，《薔薇園》與《真境花園》，見薩迪著、張鴻年譯，《薔薇園》，與（波斯）薩迪著、楊萬寶譯，《真境花園全譯》。

41 張鴻年，〈波斯大詩人薩迪和《果園》《薔薇園》（譯者序）〉，頁 11。

42 中國穆斯林經堂教育的課本有「十三本經」或「十四本經」之說，專指經堂或經文大學教授用的課本。按所讀的順序為：《連五本》、《遭五・米蘇巴哈》、《滿倆》、《白亞尼》、《客倆目》、《舍拉哈・偉憂業》、《亥瓦伊・米那哈基》、《虎托布》、《古洛斯坦》、《艾爾白歐》、《米爾薩德》、《艾篩爾圖・來麥阿特》、《古蘭經》等，見李興華、秦惠彬、馮金源、沙秋真合著，《中國伊斯蘭教史》，頁 510-516。

43 高占福，〈伊斯蘭經堂教育與回族社會的關係〉，頁 106。

筆來書寫文字，於此可能因用筆習慣不同，也可能是爲兼具美觀而省略筆畫，把阿拉伯文純粹視爲幾何化後的裝飾。然而，正德官窯器皿上的回回文字，不只書寫醜陋，且有錯寫的狀況，非上述理由所能解釋。因此，官窯上的回回文字應是中國瓷工繪飾，並且有回回文「稿本」的存在，但繪寫者不諳回回文之書寫，僅能照摹照臨，故書寫板滯稚拙、錯誤百出，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明朝爲了與周邊各國各族往來，在永樂五年（1407）設置四夷館，以造就翻譯人才；四夷館初設時包括八館，即「韃靼」、「女真」、「回回」、「西番」、「西天」、「百夷」、「高昌」、「緬甸」，其中的「回回」館，就是一所官辦的波斯語學校。[44] 因此回顧明代情境，使用流傳稿本或是聘請嫻熟回回語的人來書寫回回文並非難事，但是從這些作品的書寫技巧看來，顯然並未如此。然而，觀察正德官窯的〈描紅回文盤〉，其書寫文字明顯較爲工整流利且容易辨識。由此可見，描紅回文盤與飾有回回文的青花作品應不屬同一工坊所製作。

此外，明代南陽府衙舊址附近，發現器底帶有「正德年製」款識的阿拉伯文銅爐與阿拉伯文銅瓶各一（圖 29）；[45] 此件銅爐上鑄有以阿拉伯文字寫成的伊斯蘭教清真言，銅瓶上則有「一切讚頌全歸阿拉，贊阿拉清淨」的字句。[46] 這兩件「正德年製」款銅器中的文字，雖也是置付於開光內，但皆作類似花瓣形的開光，且全是在開光內書寫整句，未有把單字拆開的表現形式之例，相對於正德官窯瓷器上的回回文字較爲刻板的寫法，「正德年製」款銅器上所裝飾的阿拉伯文字，則寫法流暢，粗細變化有致。而目前所見「正德年製」銅器上飾有的文字意義也只侷限於伊斯蘭教義的相關內容。[47] 當時的南陽已建有清真寺，[48] 而帶有「正德年製」款銘者當是爲皇家製作之物，因此這兩件阿拉伯文銅器也算是正德朝官方控管的工藝美術群。從各方面文字表現的形態看來，銅器與瓷器的製作工坊並不相同，因此在器物上裝飾回回文也許是正德朝共同風靡的現象。

---

44 劉迎勝，《《回回館雜學》與《回回館譯語》研究》，頁 3。

45 吳東閣，〈南陽發現明代伊斯蘭文物〉，頁 25。

46 吳東閣，〈南陽發現明代伊斯蘭文物〉，頁 25。

47 關於鑄有「正德年製」銘的作品，尚有〈嵌赤銅阿拉伯文銅香爐〉、〈方形銅爐〉、〈三足香爐〉、〈阿拉伯文銅香爐〉等，器面上皆以阿拉伯文鐫有贊頌真主阿拉或清真言等，圖見陳育寧、湯曉芳編著，《中國回族文物》，頁 171、172、176。

48 南陽地區的清真寺始建年代最早者，首推唐河縣三基屯清真寺，其建於明宣德（1426-1435）年間，次為天啟乙丑（1625）年所建的新野縣沙堰清真寺。見胡云生，〈南陽的清真寺〉，頁 31。

上述筆者就蒐羅所得的六十八件正德官窯中飾有回回文的作品，以文字形態進行分類，得出青花器皿與描紅盤兩種類型作品的相異。不過，尚有少數幾件作品無法歸納，必須獨立討論。首先，土耳其砲門宮收藏帶「大明正德年製」六字官款的〈青花龍唐草文字紋碗〉（圖 30-a，附錄 45），與前述第一類正德官窯青花作品相比，就龍紋表現來看，龍身部分較爲瘦削、筆畫簡單並未描寫鱗片，花卉與接近口沿之波浪紋也不如其它官窯作品精緻，不只描寫較爲粗略，碗底書寫款識處甚至有縮釉現象（圖 30-b），製作手法明顯粗糙許多。這件作品的碗心內壁置有五個等大的正圓開光，正中一圓，四方各有一圓相接；內壁口緣滿飾文字一圈，唯其中文字皆呈由盤心向外看正立，碗壁內空白處填有卷草雲頭紋。圍繞正中圓心的四個圓形開光，其內文字完全相同，阿拉伯文原文寫爲：「لا فتا الا على لاسيف الا ذو الفقره و على هو الحق لا موت اصيبالا بالاجل」必須注意的是，這類的文字也有許多錯寫的現象。[49] 此句漢譯後意義爲：「沒有英雄像阿里一樣，沒有劍像阿里的劍一樣，[50] 阿里是真理。若預定的年歲未到，死亡就不會到。」碗內的口沿周圍寫著：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ناد عليا مظهر العجائب، تجده عونا لک فى النوائب

المعولى الى الله حاجت،[51] كل هم وغم سينجلى بنبوتک يا محمد بولايتک

يا على يا على يا على بحق ذى الملک والملكوت، اعتصمت بذى العزة و القدرة

الجبروت، و توكلنا على الذى لا ينام و لا يموت ، دخلت فى حرم الله و فى

حفظ الله من شر البريت[52] اجمعين بحق حم[53] بحق كهيعص[54] و عسق[55] و لا حول

و لا قوت[56] الا بالله العلى العظيم صلى الله على المسطفى[57] محمد و

آله اجمعين سلم تسليما كثيرا كبيربفضلک و رحمتک يا ارحم الراحمين

---

49 如「الفقره」一詞應更正為「الفقار」，「اصيب」應更正為「يصيب」或「نصيب」，「فتا」則應更正為「فتى」。

50 「阿里劍」原文作「ذو الفقار」（音「dhul-fiqar」），原是穆罕默德從大天使哲布勒伊來手中所得，因阿里屢立戰功而轉送給阿里．外形雙尖雙刃，尖處寬於把柄處，劍身兩面俱刻有阿拉伯文字。

51 「حاجت」一詞錯寫，應該更正為「حاجة」。

52 「البريت」一詞錯寫，應該更正為「البرية」。

53 「حم」是《古蘭經》裡密碼性的縮略字（使用在阿拉與穆罕默德之間私下的言語），字面上沒有實際的意思，卻具有其重要性。

54 「「كهيعص」與上註意義相同。

55 「و عسق」與上註意義相同。

56 「قوت」一詞錯寫，應更正為「قوة」。

57 「المسطفى」一詞錯寫，應更正為「مصطفى」。

此爲禱告詞，可漢譯爲：

奉至慈至聖的阿拉之名，來讚美阿里是象徵偉大的吧！發現他是當你不幸的時候會幫助你的。如果我需要跟阿拉要求甚麼，就藉著阿里，因為有了先知穆罕默德以及阿里的繼承人，所有的憂傷和悲痛都會一掃而空。噢！阿里！噢！阿里！噢！阿里！奉有權柄及天國的那位的真理，我依靠那位光榮的、有權力的以及全能的，我們依靠那位不死亡也不睡覺的，我進入阿拉的聖所，在阿拉的保護下避免所有來自人的傷害，奉《古蘭經》的真理，除了偉大卓越的阿拉，沒有人有力量與能力。阿拉讚揚穆罕默德以及他所有的子孫，並且致上最深的敬意，以你的恩惠與憐憫，因為你是最具憐憫的。

另外該器正中一圓內文字繞著圓心以輻射形態書寫阿拉伯文，原文是「سلم تسليما كثيرا كبيرا بفضلك و رحمتك يا ارحم الراحمين」，漢譯內容：「祈求阿拉贈與祝福與尊榮給他，因爲你是最仁慈的。」從碗心內四圓與口沿的文字看來，這裡接受祝福與尊榮的應爲「阿里」，整件器內的文字內容與伊斯蘭教三大教派中的「什葉派」(Shiàh) 思想息息相關。「什葉」一詞在阿拉伯文爲「الشيعة」，原意爲「追隨者」，專指擁護第四任哈里發「阿里」(Ali) 之信徒，[58] 在今日伊斯蘭世界屬少數派，主要分佈在今伊朗、土耳其、伊拉克、葉門、巴林、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地。[59] 同處所藏另見一件「大明宣德年造」款〈青花阿拉伯文盤〉（圖 31，附錄 46），已有學者指出此件作品之款識爲僞款，且應是十六世紀初年作品。[60] 除此之外，其內面文字佈局與內容與帶有「大明正德年製」六字官款的〈青花龍唐草文字紋碗〉完全相同，而正德官窯作品中也有許多僞託「大明宣德年製」之作，筆者暫時將該作品置入正德官窯脈絡討論。另見科威特博物館藏有與此件青花大盤完全相同的作品（圖 32-a），但底面款識爲「大明弘治年製」（圖 32-b），推測這類作品從弘治年間已經開始製作。

58 伊斯蘭教的三大教派為「順尼派」、「什葉派」與「蘇非派」，其分歧始於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逝世後，一派主張應由選舉方式選出新的繼承人，即「順尼派」，占今日穆斯林世界 90% 以上；另一派主張擁護阿里及其後裔為繼承人，是為「什葉派」；另外有一群神秘主義與禁欲主義的奉行者，重視精神修鍊，期能達到「人主合一」的最高境界，是為「蘇非派」。詳見凱倫・阿姆斯壯著，林宗憲譯，《伊斯蘭》，頁 6-8。

59 馬景，〈伊斯蘭教三大教派〉，頁 50-52。

60 Regina Krahl, edited by John Ayers,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A Complete Catalogue Ⅱ Yuan and Ming Dynasty*, p. 579.

另有書寫回回文字但無開光形式者，如藏於土耳其砲門宮的〈青花文字紋碗〉（圖 25，附錄 44），此件作品除了前述碗心寫有波斯文「恩典」與從碗心輻射四句文字同樣書寫「清真言」之外，其碗壁重複書寫著：「الهمّ صلى على محمد و آل محمد」，此爲阿拉伯文，漢譯爲：「啊！神啊！啊！阿拉，讚揚穆罕默德和他的眷屬（或家庭）。」從「穆罕默德和他的眷屬（或家庭）」一詞，令人聯想到同時擁有穆罕默德的姪子與女婿這樣的雙重身份，即什葉派的領導人——阿里，因而此件作品書寫文字仍然屬於伊斯蘭教什葉派的內容範疇。

上述幾件作品的品質、風格與文字內容皆與正德官窯其它青花與描紅回文盤不同，又恰好皆是中東地區藏品，可能是爲了外銷或作爲外交禮物送往信仰什葉派的伊斯蘭地區。至於此項觀點，已故三上次男先生提及十六世紀初中亞人阿里．阿克巴爾所撰的《中國紀行》中，記有明武宗曾贈予兩件飾有阿拉伯文字的中國陶瓷給奧斯曼帝國（Osman Empire, 1299-1922）皇帝賽利姆一世（Salim I, 1512-1520）；[61] 而三上先生認爲那些作品即爲藏在土耳其砲門宮的正德回回文瓷器。[62] 不過就筆者所見該書目前兩中文譯本均未有類似的描述，而小田壽典甚至註明三上先生所言一事絕無可能，應是誤解所致。[63] 依筆者之見，十六世紀初奧斯曼帝國奉順尼派（Sunni）爲國教，除非是中國使者傳遞錯誤的訊息，否則不可能將寫有什葉派文字內容的瓷器做爲禮物送給信仰順尼派的奧斯曼帝國國王。因此這幾件作品是否透過其它國家的轉贈流傳至土耳其砲門宮，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然而，事實上明代官窯器面上最普遍的「外文裝飾」，其實是從永樂朝開始幾乎遍佈明代各朝的梵文與藏文。[64] 關於瓷器表面的文字裝飾佈局，清末民初許之衡《飲流齋說瓷》云：

> 瓷品有回回、喇嘛、西洋等文者：回回文或於花地開光處書之，或有全體書回回文而不繪花者；喇嘛文多於繪花之上書之，即明瓷所謂花捧真言字者也，或作圓形字如八卦之圍列。[65]

從前述可知，「回回文」的佈局方式正如其言，有於花地開光置文字者與不作

61 三上次男，《陶磁の道—東西文明の接点をたずねて—》，頁 106。

62 三杉隆敏，〈中國明後期．清朝の染付〉，頁 185。

63 小田壽典原著，郭汾譯，〈十六世紀初有關中國的伊斯蘭史料——對阿里．阿克巴爾著《中國志》的重新評價〉，頁 256-257。

64 明代官窯中出現帶有梵文與藏文紋飾最早在永樂朝，之後遍佈於宣德、成化、正德、萬曆等朝，相關研究見張東，〈論明代景德鎮官窯中的梵文和藏文瓷器〉，頁 144-157。

65 許之衡，《飲流齋說瓷》，收入伍躍、趙令雯點校整理，《古瓷鑑定指南》，頁 194。

開光而直接書寫文字者；所謂「喇嘛文」當指梵文或藏文，就明瓷上裝飾梵文或藏文者進行觀察，其文字佈局形式通常不見開光，並確實可見於花上書寫藏、梵文者。[66] 除此之外，還有另一種像是曼陀羅式的同心圓方式，是將字句環繞器身或碗心、盤心邊緣一周，其佈局形式類似藏傳佛教之宗教文物法器「轉經輪」或「轉經筒」（圖 33）的概念；其主要結構是內置有咒輪的金屬圓筒，中央再貫串一根轉軸，使圓筒連帶著內部的咒輪能流暢地轉動，信徒們相信轉動時即可獲得與念誦咒語同等的功德。[67] 法器上也有裝飾藏文或梵文者，其形式是順時針繞著器身書寫一周，這與明代官窯瓷器上裝飾藏文、梵文的形式相同，如宣德〈鬥彩藏文鴛鴦蓮池紋盤〉（圖 34）盤內口沿以青花書寫藏文《吉祥經》一周，意義爲「白晝寧夜安寧，白日中午得安寧，晝夜長久安寧兮，三寶保佑安且寧」；[68] 成化朝與弘治朝皆有燒製器表飾有梵文之官窯瓷器例子（圖 35、圖 36）。這樣的現象一般認爲與帝王信仰喇嘛教或與西藏往來賞賚有關。[69] 爲文至此，可知由於藏傳佛教經典有以古印度字體梵文及藏文寫成的，連同帶梵、藏文的瓷器上裝飾佈局也與藏傳佛教法器轉法輪的概念相似，且內容也採取藏傳佛教經典如《吉祥經》或六字真言等。

相對地，大量書寫回回文字的正德官窯作品，其運用開光來佈局的形式與伊斯蘭藝術傳統有所關聯，文字內容也多引自伊斯蘭教經典《古蘭經》與《聖訓》以及讚頌阿拉與穆聖的字句，因此可以推測，官窯作品由於各自承襲的文化不同，文字所選取的表現形式也就相對有所差異，這樣的推論可以在現爲國立故宮博物院所收藏〈正德紅彩梵文盤〉（圖 37）得到印證。該作品裝飾文字的佈局方式即爲繞盤緣一周，這種佈局在正德官窯作品中顯得相當特殊，但和其它時代官窯中施有藏文或梵文的作品相同，可見窯工製作時有意識區分伊斯蘭教與藏傳佛教兩種不同文化，並呈現於所對應產生的文字佈局表現。

(二) 作品器形

觀察正德官窯中青花與描紅盤兩大類作品可得知，正德官窯作品中，尤其是飾有回回文者，出現許多前所未見、承繼由來不明的新穎造形。這些作品如插屏、帽

66 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成化窯鬥彩轉枝蓮托梵文盃〉，圖見蔡和璧編輯，《成化瓷器特展圖錄》，頁 166，圖 168。

67 馮明珠、索文清主編，《聖地西藏——最接近天空的寶藏》，作品 100 鍾子寅說明，頁 255。

68 藏文譯文見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景德鎮出土明初官窯瓷器》，作品 132 說明，頁 324。

69 劉新園，〈景德鎮出土明成化官窯遺跡與遺物之研究〉，頁 37-40。

架[70]（一說爲花插[71]、筆筒[72]、香爐[73]）等，均未見於伊斯蘭世界，可見是中國境內所使用的器物，且從這些作品的尺寸大小看來，很可能是實用器皿。John Pope 論及阿德比爾廟（Ardebil Shrine）收藏的中國陶瓷時，將正德朝出現的特殊器形歸因於中近東的影響。[74] 不過就此論點，John Pope 並未列舉具體作品來說明。

然而，宗教難免有入境隨俗的狀況，或因傳教方便，或以時地遷移而權宜變化，關於正德官窯特殊器形的問題，或許也應考慮宗教情境。伊斯蘭教約在唐代隨著由陸路與海道東來的阿拉伯、波斯商人傳入中國，這些人在中國繁衍生息，後來成爲中國穆斯林的始祖。宋代爲增加海舶貿易收入而禮遇蕃商，大批穆斯林商人來華，也間接促進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佈；[75] 到了元代，統治階層倚重含括回回人在內的色目人，且蒙古大軍的鐵蹄已將東西疆界打破，在中亞交通道上開闢「驛路」，設置「驛騎」、「鋪牛」與「郵人」等，[76] 不只促進了東西商業與文化的交流，也使得穆斯林大舉東來，幾乎遍佈中國各省。到了明代初年，雖然官方強化夷夏之防，但對伊斯蘭教不僅寬容且推崇，如明太祖與明成祖未信奉伊斯蘭教，但皆有敕修清真寺的紀錄。[77] 此外，明代推翻蒙古政權，元宗室退回漠北，在當時居留下來的穆斯林，由於社會地位改變，外部壓力加大，內聚力增強，所以回族漸漸形成。[78]

至此中國內地的伊斯蘭教徒與西部邊境的穆斯林失去了聯繫，處於各自獨立發展的狀態。因此，明代伊斯蘭教開始分化爲兩個不同系統：西北邊疆仍舊保有中亞的模式，在中國境內伊斯蘭教卻有中國化的趨勢，在許多方面出現相互交融的情況。其中體現在伊斯蘭教最重要的清真寺建築，則是在外觀方面由中亞式磚石結構改爲木結構（圖 38），尖拱形的洞式門窗變爲中國式的重花門或月洞形門（圖 39）；寺內則不同於中東地區幾乎以布簾書寫文句，而是在中國式枋額和牌匾以阿文書寫

70 名稱來源見 Sir Harry Garner, *Oriental Blue And White*, p. 28.

71 名稱來源見耿寶昌主編，《青花釉裡紅》（中），頁 63。

72 名稱來源見 *The World's Great Collections: Oriental Ceramics Vol.7 Mus'ee Guimet, Paris* 單色圖版中第 61、62。

73 匿名審查者提出大英博物館 Jessica Harrison-Hall 女士認為此件作品用途為「香爐」，感謝其寶貴意見。

74 John Alexander Pope, *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 pp. 121-122.

75 葛壯，《伊斯蘭教與中國社會》，頁 17-27。

76 葛壯，《伊斯蘭教與中國社會》，頁 53-70。.

77 葛壯，《伊斯蘭教與中國社會》，頁 113-123。

78 丁明仁，《伊斯蘭文化在中國》，頁 16。

《古蘭經》等文句（圖 40）。[79]

除此之外，伊斯蘭教之中國化，也產生僅限於中國穆斯林在宗教儀式中所使用的器物，即俗稱之「中國穆斯林漢形制文物」。其中，亦有專用以燒檀香的香爐，並常與香盒及瓶共伴出現，稱爲「爐瓶盒三件」。[80] 1956 年南京牛首山弘覺寺塔基地宮出土一件青玉貫耳瓶，造形類似中國穆斯林淨身用的吊罐（或稱吊桶），[81] 另也有出二齒小銀叉，柄頭背面戳有極小的阿拉伯文印記，且有明顯的使用痕跡，說明墓主生前似有阿拉伯人的生活習俗。[82] 同塔內也發現有「爐瓶盒三件」的組合（圖 41）。觀察正德作品裝飾回回文的作品群，的確常有爐、瓶、盒三種器形，這讓人不得不聯想這些作品與中國穆斯林伊斯蘭教儀式的淵源。

所謂「漢形制文物」中的「爐瓶盒三件」，嚴格來說，在信奉伊斯蘭的地區中也僅使用於中國西北地方的「蘇非門宦」，其在明代主要聚集在西北甘寧青地區，在其它地區則無。[83] 林長寬教授曾提及蘇非派中虎非亞耶的一個支派——鮮門門宦，在舉行「爾曼里」（Amani）儀式的實況：

> 教主站在方桌之前，點燃一把香，分給每個參與儀式的人，等到每個人拿到一支香後，把剩下的插入香爐中，信徒們用兩手持香，首先把香高舉過頭，然後低一點的額頭，鼻子，嘴巴，然後親吻它，之後，他們要跪下來，一手拿香，一手拿帽子，面向香爐磕頭，磕三個頭。[84]

另有兩件分別藏於山西省文物商店與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天順年款香爐（圖 42-a），該器器表僅見波斯文，並無常見的開光及卷雲紋等裝飾，與正德年製官窯風格迥異。這兩件天順年款香爐上的書寫內容相同，皆出自波斯詩人薩迪

---

79 詳細情形請見陳育寧、湯曉芳編著，《中國回族文物》。

80 見馮增烈，〈漢形制伊斯蘭文物述略〉，頁 119-120。

81 葛曉康，〈南京牛首山弘覺寺塔地宮初探〉，頁 110-116。

82 王引，〈鄭和家世及其墓葬考略〉，頁 70-72。

83 所謂「蘇非派」是伊斯蘭教內部衍生的神秘主義派別，英國學者 J. S. Trimingham 對「Sufi」下了一個廣泛較被接受的定義，他認為：「凡是相信人與阿拉之間直接經驗的可能，而脫離本身原本的軌道，投入此狀態者，稱之為蘇非者」。對於蘇非者本身而言，他們則認為自己是「阿拉的選民」，喜歡稱呼自己為真理的追隨者 (Ahl al-Haqq)。「蘇非派」早在元代傳入中國，歷經四個世紀，直到清朝初年，終於在回族等穆斯林民族聚居的甘寧青黃土高原扎下了根，最終形成憂德林耶、虎非耶、哲合忍耶、庫不林耶四個派別，其下又各分為若干支派。而「門宦」一詞則是蘇非教派分支傳入甘寧青地區後逐漸形成的通稱，見林長寬，《中國回教之發展及其運動》，頁 77；周燮藩、沙秋真著，《伊斯蘭教在中國》，頁 115-151。

84 林長寬，《中國回教之發展及其運動》，頁 91。

（1208-1292）的詩集《果園》。[85] 據載薩迪曾到過中國新疆，而元代時來華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Ibn Battuta, 1304-1377），其遊記中記述他在杭州聽到一個中國歌手以波斯語唱薩迪的抒情詩，[86] 可見這件作品不只是器形與使用文字與伊斯蘭信仰相關，連文字內容也補充了伊斯蘭文化在早期進入中國的證據。而藏於山西省文物商店者，器裏底部署有「天順七年大同馬」紀年款識（圖 42-b），器裏口沿下署「大同馬氏書」（圖 42-a）。俗諺「十個回回九個馬」，「馬」姓通常與回族淵源甚深，[87] 若考慮是當地馬姓回族的訂購甚或是馬姓陶工製作或落款，也不無可能。

中國穆斯林漢形制文物中亦有插屏上書寫《古蘭經》文字的例子；[88] 再者，置於《古蘭經》語錄的枋額、牌匾的書寫有作筆架或「山」字之式者，[89] 恰可解釋正德官窯中某些創新器形出現的原因，如青花硯屏（圖 21）、青花筆架（圖 28）等，同時更強化了其欲聯繫伊斯蘭信仰的意念；況且正德官窯中飾有回回文者，並非全部送往伊斯蘭地區做爲外交餽贈或貿易用途，而是受中國的穆斯林使用脈絡影響，可以再次獲得印證。這些狀況，長久以來爲論者所忽略，當然也難以察見器形上所顯現的伊斯蘭因素。

（三）小經文款識

前述正德官窯的八件〈描紅回文盤〉，除了器表佈滿回回文字，卻連款識也均以波斯文字母拼寫。以漢字書寫帝王年號作爲官窯款識的習慣，從永樂朝開始持續了約一百多年，正德描紅回文盤則是明初以來首開以外國文字書寫象徵皇權與官方年款之例，這一特殊現象，值得深入探討。

---

85 王曉蓮譯文中說明爐上文字出於薩迪《果園》：「年輕人要敬主，就應在今天，明朝人老，青春一去不返還。只自己守齋，遠不算真正的穆斯林，還應分出食物賙濟窮人。如你心無煩擾身體有力，身在寬廣球場應把馬球猛擊。為政萬萬不可刺傷貧民百姓的心，欺壓百姓就是在掘自家的根。謙遜的智者宛如果樹一棵，掛果越多枝頭越加彎曲」，見王曉蓮，〈青花三足筒爐〉，頁 18。該作品譯文還可見於張鴻年，〈波斯大詩人薩迪和《果園》《薔薇園》（譯者序）〉，頁 108、320、20、320、174，且爐上靠近器底處有一段並非《果園》內容、乃是以阿拉伯文書寫的結束祝福語，王曉蓮並未譯出，筆者補充如下：عاقبت الخير و السعادة تمت（阿拉伯文），可譯為「福報（好事）接踵而來。」

86 張鴻年，〈波斯大詩人薩迪和《果園》《薔薇園》（譯者序）〉，頁 21。

87 明代穆斯林的改姓，不只是政治強制的結果，主要是文化融合的必然。這種改姓是有規律的，大多以原來名字中的某個字為姓，如馬、穆、哈、丁、沙、納等，此外還有朝廷賜姓。因為原名中含近似「馬」的音較多，所以中國穆斯林馬姓者特別多。見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蘭研究室編、秦惠彬主編，《中國伊斯蘭教基礎知識》，頁 35。

88 見馮增烈，〈漢形制伊斯蘭文物述略〉，頁 124。

89 見馮增烈，〈漢形制伊斯蘭文物述略〉，頁 121。

這八件〈描紅回文盤〉可依據款識內容與長短分爲兩類，其一是於盤底圈足僅寫有「دی مینک جنک دی نیک جی」，如本院（圖 8-a、9-a、10-a，附錄 63-65）三件藏品，以及上海博物館（圖 12-b，附錄 67）和科威特博物館（圖 13-b，附錄 68）藏品，其文字雖個別由阿拉伯文字母組成，但內容卻無法解讀。其它三件作品（圖 6-a、7-a、11-a，附錄 61、62、66）則是款識較長，部分文字可以漢譯解釋。關於第一類寫有「دی مینک جنک دی نیک جی」的作品，其實是中國穆斯林獨有的書寫方式——「小經文字」，由於回族來華之初不諳漢語，爲了便於學習，遂以阿拉伯文或波斯文字母將漢語讀音拼出，明代回族穆斯林也稱之爲「小兒經」、「小兒錦」、「狹經」或「消經」等，[90] 在西安大學習巷清真寺便留有一塊頌揚修清真寺善舉的阿拉伯文碑文，撰於回曆 740 年（相當於西元十三世紀中葉），其中已有用阿拉伯字母拼出回回人的漢語名稱與籍地，由此可知小經文字在十三至十四世紀之交可能已流行於中國民間，[91] 特別廣佈於回族與西北東鄉族、撒拉族人民之中，[92] 而該五件瓷盤即是以「小經文字」取代以往使用漢字標示的官窯款識，念作「di ming jingdi nian zhi」，音似中文「大明正德年製」。[93] 令人注目的是，明代西北地區穆斯林專用的「小經文字」，在十六世紀竟然出現在官方生產的器皿上，甚至是用於書寫標誌所有權屬於官方的款識，頗爲耐人尋味。

除了上述五件以小經文字書寫的「大明正德年製」描紅盤之外，存世所見其它三件作品的款識文字則稍有差異。國立故宮博物院（圖 7，附錄 62）與北京故宮博物院（圖 11，附錄 66）所藏描紅盤的款識分別寫著「دی مینک خان ، یعنی شاه سلیمان عمارت کرد」與「دی مینک جنک دی نیک جی، یعنی شاه سلیمان عمارت کرد」，前者款識部位可漢譯爲：「大明正德年製，也就是蘇賚曼國王所製作」；後者則爲：「大明汗，也就是蘇賚曼國王所製作」。[94] 另件本院所藏描紅盤（圖 6，附錄 61）中

90 劉迎勝，〈關於我國部分穆斯林民族中通行的「小經」文字的幾個問題〉，頁 20-21。

91 劉迎勝，〈回族與其他一些西北穆斯林民族文字形成史初探——從回回字到「小經」文字〉，頁 8。

92 劉迎勝，〈回族與其他一些西北穆斯林民族文字形成史初探——從回回字到「小經」文字〉，頁 5。

93 見駱愛麗，〈中亞穆斯林後裔在中國活動初探——以正德朝兩件礬紅回回文瓷器為基礎〉，頁 1-19。

94 前半句書寫「大明正德年製」(دی مینک جنک دی نیک جی)，後者則是寫「大明汗」(دی مینک خان)。「خان」一字則是中文的「汗」，是「國王」的意思。後半句則內容相同，但是由波斯文寫成，可拆為「یعنی」(「也就是」、「相當於」)、「شاه」(「國王」、「大人」，一種讚美詞)、「سلیمان」(人名，中文可譯為「蘇賚曼」)、「عمارت کرد」(「(他) 建立了」或「(他) 蓋好了」或「(他) 弄好了」之意，可引申為「製造完畢」)。關於此盤以往亦有其它譯文，與筆者略有差異，請見馬建春，〈明代陶瓷與伊斯蘭文化〉，頁 101；駱愛麗，〈中亞穆斯林後裔在中國活動初探——以

的背面款識處以小經文字與波斯文寫著：「دی مینک شاه سلیمان عمارت کرده است」，亦即「大明汗蘇賚曼國王所製造」之意。由三件作品的文意彼此推敲：大明汗＝大明正德＝蘇賚曼國王，亦即大明王朝的國王——正德皇帝，與蘇賚曼國王實爲同一人。「蘇賚曼」（原文作「سلیمان」，音「Sulaiman」）原來是伊斯蘭教的前身猶太教一位先知的名字，但之後在阿拉伯地區是非常通俗的姓名。因此「蘇賚曼」，可能就是明武宗的「經名」。[95]

事實上，正德官窯中以外國文字書寫款識的現象，其實不只表現在書寫有小經文字的〈描紅回文盤〉當中，目前所見尚有六件（圖 43）以八思巴文書「正德年製」款識。[96] 八思巴文是元代開國皇帝忽必烈時之國師八思巴制定的，用以取代標音不夠準確的蒙古文字，主要是作爲漢字標音之用。入明以後，八思巴文不再被使用，僅於北方通行過一段時間，但明末蒙古人轉而重新使用蒙古文字，八思巴文消失，在元代瓷器也有器表書八思巴文字的例子，[97] Hobson 認爲這些作品是爲賞賜喇嘛之用，使用八思巴文是作爲致敬也同時表示友好。[98] 此外忽必烈與八思巴國師的關係也值得注意。1271 年，忽必烈稱帝後即封八思巴爲帝師、大寶法王。此後元代歷代皇帝均選薩迦教派有學識的大喇嘛爲國師。正德時藏傳佛教盛行，朝中也圍繞許多喇嘛，也許以八思巴文標示「正德年製」官款的作品，也暗示了明武宗將喇嘛視爲國師般崇敬。綜上所論，正德官窯瓷器不止顯現了明武宗與藏傳佛教的關係，在帶有回回文的器皿中更是大量地留下了伊斯蘭教的痕跡，可見正德官窯確有一新的特殊力量在左右其品味。

正德朝兩件礬紅回回文瓷器為基礎〉，頁 12-16；駱愛麗，《十五—十六世紀的回回文與中國伊斯蘭教文化研究》，頁 203-208；陳玉秀，〈以紋識意——從阿拉伯文紋飾談正德時期伊斯蘭教的意涵〉，頁 78-91。

95 中國的穆斯林除了有漢姓漢名外，還有個「經名」，通常採用美好的詞彙或先賢之名。見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蘭研究室編、秦惠彬主編，《中國伊斯蘭教基礎知識》，頁 133。

96 器底書八思巴文「正德年製」款的作品分別可見於佛利爾美術館與大英博物館、北京故宮博物院各有一件，另二件則為私人收藏品。又 1987 年景德鎮珠山正德地層中曾挖掘出一件正德青花龍紋碗殘片，其碗底也可見清晰的八思巴文「正德年製」款識。見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景德鎮珠山出土陶瓷》，圖 253 及說明。

97 二十世紀初 Hobson 曾提及瓷器上的八思巴文，並舉出元代青磁上的八思巴文刻印以及元代磁州窯的例子，見 R. L. Hobson, “Chinese Porcelain Fragments from Aidhab, and Some Bashpa Inscriptions,” p. 21. 關於八思巴文在瓷器上作為年款或款識的研究，還可參考葛師科，〈也談巴思八文款青花瓷器的年代〉，頁 38、43-47；呂成龍，〈關於八思巴字款青花瓷器年代之我見〉，頁 77-83。

98 R. L. Hobson, “Chinese Porcelain Fragments from Aidhab, and Some Bashpa Inscriptions,” p. 21.

二、正德官窯回回文瓷器顯現的帝王品味

上一章分別從紋飾、器形與款識探索正德官窯中回回文作品群的風格與內涵。然而，這些飾有回回文、且器形及款識具有特殊涵義的器皿，究竟為何在正德朝被大量製作？主導者又是誰？可能必須先從正德官窯瓷器的使用者談起。

一般而言，官窯器皿的使用者雖以皇帝為主，但藩王、后妃、貴戚、勛臣、宦官等與皇室相關成員也可能是官窯陶瓷的消費者。然而明代官窯不若清代官窯留有造辦處資料可供索尋，我們僅能從作品的使用者中，間接推敲較有可能主導官窯品味的關鍵人物。

以往論者曾主張正德官窯中飾有回回文紋飾的作品是當時宮中權力熾盛的穆斯林宦官所訂製。[99] 其中，佐藤莎拉從景德鎮督陶官的角度切入，援引史料：「正德初置御器廠。專管御器復用中官也。故至嘉靖又裁之云。」[100]「正德十五年（1520）已酉、命太監尹輔往饒州燒造瓷器。」[101] 指出正德朝之督陶官多為宦官；而當時許多宦官是伊斯蘭教徒，佐藤氏便聯繫兩者，推論正德官窯回回文器皿是穆斯林宦官品味下的產物。[102] 事實上，儘管當時崇信伊斯蘭教的宦官很多，也無法肯定宦官督陶官即為穆斯林，除了上述資料提及的太監「尹輔」，其它史籍可見的宦官督陶官姓名如梁太監、邱得等，[103] 目前皆無法尋索其人生平與信仰傾向，也無法證明其與伊斯蘭教的聯繫。然而，即便宦官爪牙籠罩正德朝，從《明實錄》等種種記錄也可

---

99 如 Basil Gray, “The Influence of Near Eastern Metalwork on Chinese Ceramics,” pp. 47-60; Berthold Laufer, “Chinese Muhammedan Bronze,” pp. 132-147; Sir Harry Garner, *Oriental Blue And White*, pp. 28-31; Regina Krahl, edited by John Ayers,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A Complete Catalogue II Yuan and Ming Dynasty*, pp. 534-536; John Carswell, *Blue and White: Chinese Porcelain Around the World*, pp. 138-141; Jessica Harrison-Hall, *Ming Ceramics in the British Museum*, p. 188, p.190; 佐藤サアラ，〈正德アラビア文字裝飾青花に關する一考察—その生產背景と景德鎮窯業における位置－〉，頁 65-98。

100 朱琰，《陶說》，卷三，頁 86。

101 《明武宗實錄》，卷一九四，頁 3639。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己酉日。

102 佐藤サアラ，〈正德アラビア文字裝飾青花に關する一考察—その生產背景と景德鎮窯業における位置－〉，頁 65-98。

103 據彭濤所彙整的史料，正德年間可得知姓名的宦官督陶官有梁太監（「正德間，梁太監開報民戶，占籍在官。」出於嘉靖本《江西省大志》匠役條）、邱得（「……未几，鎮守、燒造太監相繼差出。百姓聞之，相顧失色，且惧且泣曰：『人禍乃至乎。』頃蒙聖明將邱得拿問，尹輔取回，百姓聞皆私慶曰：『人禍幸不來乎。』出於詹珊，《重建敕封萬碩師主佑陶廟碑記》，康熙，《浮梁縣志》，卷八）與尹輔（「正德十五年，……命太監尹輔往饒州燒造磁器。」《明武宗實錄》，卷一九四。）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己酉日。見彭濤，〈明代宦官政治與景德鎮的陶政〉，頁 111、114-120。

得知，正德皇帝的確對朝中太監十分厚待，[104] 但仍舊難以想像宦官竟可輕易左右官窯圖紋之設計，甚至首開先例使用外國文字作爲官窯款識。例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一件〈青花正德丁卯字爐〉（圖 44），底部無款，器身腰部以青花書寫「欽差尚膳監太監梁等發心成造正德丁卯八月中秋吉日」，表示此件筒爐是正德二年（1507）尚膳監太監向景德鎮訂製的作品。[105] 也由此得知，正德朝宦官的確有徇私訂製瓷器的例子，但並未擅加皇室官款。況且，明代官窯的督陶官由宦官掌權並非始於正德朝，《關中王老公祖鼎建貽休堂記》中即有：「我太祖高皇帝三十五年，改陶廠爲御器廠，欽命中官一員，特董燒造。」[106] 明人詹珊《重建敕封萬碩師主佑陶廟碑記》也記載：「至我朝洪武末，始建御器廠，督以中官。」[107] 成化、弘治間以及嘉靖朝也各有派遣宦官督陶的紀錄，[108] 說明正德朝前後五十年間，景德鎮督陶官幾乎皆委任宦官，何以官窯中以回回文爲裝飾的現象幾乎集中於正德朝？

對於「宦官主導說」的檢證，還可從也由宦官擔任司職的宮廷繪畫觀察。凡懷有技藝的工匠若欲從事明代宮廷繪畫之職，皆須經執事宦官同意後才可入工部。[109] 儘管如此，當宮廷畫家描繪皇帝御容時，作爲畫主的帝王往往會對畫家積極地表示意見；[110] 觀察《明武宗畫像》（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 45），可以清楚地發現，同樣是明代帝王的肖像畫，儘管自太祖至孝宗朝已從單純地以帝王本身充斥畫面轉而

---

104 如皇帝賜給太監的喪葬費用遠超過前朝，「正德十二年五月乙丑工部太監等官病故，成化、弘治間造墳安葬給銀不過五十兩，若連享堂碑亭者百無一二。自正德以來，奉特旨造建者無月無之，率給銀五百兩。本部俱于別項料價銀內借用，今已借過三萬二千四百八十餘兩。而聶璽、劉宣兩人者尚無從措辦。……。得旨：『以後宜斟酌行。』既而為太監徐通治葬復如前例，竟無所裁減云。」而太監官祿之高，也讓大臣上疏反映之：正德十四年三月丙申兵科左給事中徐之鸞等疏言：「故太監馬永成，尊顯用事者十有餘年，且迭受恩蔭，侄姓以下皆都高爵，列美官，亦已過矣，而太監趙享復為陳乞，升授見任者至九十餘人。不知永成何功，而非份之恩濫無紀極如此！且一太監死，而官者九十餘人，臣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伏望皇上為天下惜名器，裁抑幸恩。」。見《明武宗實錄》，卷一四九，頁 2901。正德十二年五月乙丑日與《明武宗實錄》，卷一七二。頁 3313。正德十四年三月丙申日。

105 見耿寶昌主編，《青花釉裡紅》（中），頁 60，圖 55 之說明。明代與宮膳有關的機構有外朝的光祿寺內府的尚膳監及女官系統的尚食局。其中「尚膳監」是負責製辦皇帝飲食的機構，一般由太監擔任，詳見邱仲麟，〈皇帝的餐桌：明代的宮膳制度及其相關問題〉，頁 24-27。

106 據劉新園文，該殘碑現藏景德鎮陶瓷館，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有拓片，文見劉新園，〈景德鎮珠山出土的明初與永樂官窯瓷器之研究〉，頁 38 與頁 42，註 3。

107 詹珊，《重建敕封萬碩師主佑陶廟碑記》，載康熙《浮梁縣志》，卷八。

108《明史》卷八十二食貨六：「成化間，遣中官之浮梁景德鎮，燒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費不貲。」《明世宗實錄》卷 160（嘉靖八年十月癸亥朔日）：「嘉靖八年十月，太監劉良奉旨督造弘治、正德中未完磁器三十餘萬。」直到九年以後，才有所變化，如王宗沐，《江西省大志》卷 7 陶書，設官：「陶監有官。先是中官一員專督。嘉靖九年裁革，以饒州府佐貳官一員管督。」王宗沐纂修；陸萬垓增修，《江西省大志》八卷。

109 林莉娜，〈明代宮廷繪畫機構制度考〉，頁 85。

110 石守謙，〈明代繪畫中的帝王品味〉，頁 225-291。

以越演越烈的背景裝飾爲主，[111] 明武宗畫像與孝宗（圖 46）卻沒有任何創新改變之處。而正德當朝最著名的宮廷畫家朱端（圖 47）與呂紀，其畫風卻完全不見任何伊斯蘭的相關元素。關於正德朝宮廷畫家的概況，顧命大臣之一劉健曾上諫說：「武宗曠職僨事，虛糜廩祿者，寧可不黜。畫史、工匠濫授官職者多至數百人，寧可不罷。」[112] 從這點看來，明武宗可能對繪畫藝術毫不留心，因此也很難檢驗出正德宮廷繪畫是否有特殊風格滲入。

復次檢驗正德朝宮廷的其它藝術趨向，除了前述帶「正德年製」款的銅器亦鐫有阿拉伯文，目前無從得知正德官窯其它工藝美術品如景泰藍、[113] 漆器 [114] 等，是否也呈現伊斯蘭風的面貌。但從「正德年製」款回回文銅器之文字表現與正德官窯回回文瓷器相異看來，可知銅器與瓷器分屬不同作坊。而兩個不同材質的作品，卻同樣具有回回文紋飾，且文字內容皆出於伊斯蘭教信仰觀，並與「漢形制伊斯蘭文物」之中爐與瓶的器形相符，無疑也呈顯伊斯蘭風的流行並非單獨存在於景德鎮官窯，此朝的宮廷工藝美術其實存在著一種全體共同的情境與趨向，即伊斯蘭宗教與文化要素的介入；因此可以確定，大量飾有回回文的器皿，其存在的時間點與明武宗即位、駕崩有非常直接的關連，或可把這群作品視爲「正德官窯」的特產。以下即從正德朝的執政者——明武宗生平著手，探討此種伊斯蘭要素的來源與作品的用途，並分析這股瀰漫正德官窯的伊斯蘭要素在明代陶瓷史上具有的獨特意義。

（一）帝王品味與官窯瓷器的關係

關於帝王品味在藝術作品上的反映，如北宋徽宗崇尚詩賦入畫，畫院考試即以唐人詩句爲題；[115] 而清代乾隆皇帝對官方產物有強烈的主導權，此點可透過對造辦處的旨諭明確得知，[116] 乾隆對陶瓷的鑑賞品味也反映在《陶瓷譜冊》以及御製詩

111 石守謙，〈明代繪畫中的帝王品味〉，頁 225-291。

112《明史》一百八十一，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99 本，頁 863。

113 就筆者所知，目前並未發現有帶正德款的景泰藍（指銅胎掐絲琺瑯）作品，見 Helmut Brinker and Albert Lutz, translated from German by Susanna Swoboda, *Chinese Cloisonné: The Pierre Uldry Collection*, pp. 105-112.

114 目前所見正統以後到正德朝並無帶款漆器剔紅作品，僅見一大衛德基金會所藏「弘治二年」款漆器，可見這種技術在正統到正德這段時間內並未中斷，但無法指出正德朝是否製造漆器，以及其面貌如何。見索予明，《中國漆工藝研究論集》，頁 52。

115 佘城，〈北宋畫院制度與組織的探討〉，頁 80；陳葆真，〈宋徽宗繪畫的美學特質——兼論其淵源和影響〉，頁 293-344。

116 張麗端，〈從《活計檔》看清高宗直接控管御製器用的兩個機制〉，頁 45-70。

上。[117] 明代則除了宮廷畫院組織可以顯示帝王的繪畫喜好，[118] 明宣宗對宮廷用瓷設計以及官窯機構的運作也有明確掌握。[119] 此外，劉新園處理成窯遺跡時，一面結合文獻、耙梳史料，推翻以往童依華及劉良佑對於成化鬥彩起於憲宗寵幸萬貴妃的推測；[120] 然而，由於當朝所崇尚的吳偉之粗獷畫風與精緻玲瓏的成化鬥彩格格不入，也啓發了謝明良教授對帝王品味是否干涉陶瓷設計的疑竇。[121] 而尹翠琪論證嘉靖官窯（1522-1566）中特殊的八卦圖案，認爲其與崇道的世宗所致力進行之「雷壇」儀式有關，也間接證明了世宗對嘉靖官窯的主導性。[122] 再者，沈德符《萬曆野獲編》中記載：

> 幼時曾於二三中貴豪家，見隆慶窯酒杯茗盌，俱繪男女私褻之狀；蓋穆宗好內，故以傳奉命造此種。然漢時發塚，則鑿甎畫壁俱有之，且有及男色者，書冊所紀甚具，則杯盌正不足怪也，以後此窯漸少，今絕不復覩矣。[123]

若此文獻記載爲是，可知明穆宗（隆慶朝，1567-1572）特好男女之事，並命窯工在官瓷上繪製春宮圖，這也是帝王品味反映在宮廷用瓷設計的顯著例子。現存史料並未提供明武宗親自頒定之所謂「御樣」的任何訊息，也無法知悉宦官督陶官是否即是正德官窯的設計者；然而無論明武宗是否對官窯瓷器的樣式有其特殊的指定與愛好，前文曾提及，象徵著皇權的官窯款識，在此時竟出現以小經文字以及八思巴文書寫的例子，令人懷疑明武宗對官窯瓷器是否曾有過特別的旨諭？例如〈青花阿拉伯文番蓮七孔花插〉（圖 48，附錄 20，國立故宮博物院），在球狀器身前後的兩面開光，一面寫著：「الهمّ امن بلده」，漢譯「阿拉會把他的國土安全化」；另一面則是「و احفظ ولده」，「也會保護他的子孫」，合讀即是「真主會護佑其社稷與後裔」；內容並非出於《古蘭經》，主要文意是爲國家與「該使用者」的子孫祈福，宦官並無後代，而國家的統治者當然爲皇帝本人，因此飾有回回文的正德官窯瓷器，其主要「觀者」與「參與者」確是正德皇帝本人。

---

117 余佩瑾，〈別有新意——以乾隆官窯的創新為例〉，頁 281-295。

118 林莉娜，〈明代宮廷繪畫機構制度考〉，頁 85。

119 劉新園，〈明宣宗與宣德官窯〉，頁 129-183。頁 18。

120 童依華，〈明成化瓷器〉；劉良佑，〈明代中期官窯與成化窯器之鑑定〉，頁 99；劉新園，〈景德鎮出土明成化官窯遺跡與遺物之研究〉，頁 37-40。

121 謝明良，〈十五世紀的中國陶瓷及其有關問題〉，頁 131-132。

122 Maggie C. K. Wan, “Motif with An Intention : Reading the Eight Trigrams on Official Porcelain of the Jiajing Period (1522-1566),” pp. 191-221.

123 沈德符撰，《萬曆野獲編》，卷二十六，〈瓷器〉，頁 654。

（二）明武宗的生平與信仰觀

以下將檢驗明武宗生平事蹟，觀察是否有任何蛛絲馬跡可以聯繫官窯的特殊狀況。這些政治上的敘述可以提供我們理解正德生平的框架，即便是看似不登大雅之堂的細節，可能都是建構其進一步真實形象的礎石；而這些基礎，可能就能夠使我們以之爲踏階，廓清明武宗本人之愛好與心態、宗教與使用器物間千絲萬縷的關係。

回顧自正德元年（1506）始，武宗就面臨顧命大臣劉健所發起剷除宦官集團「八虎」之鬥爭。翌年（1507）八月，武宗棄乾清宮，在皇城西內太液池西南岸命建住豹房。[124]「豹房」原來是宮廷豢養豹並以供觀樂之處，對明武宗而言，這不只是「豹房」，還是辦公室、佛寺、也是教場，[125] 相當於明武宗的一座離宮。朱厚照在豹房中遊樂恣肆，也引起顧命大臣之一李東陽諫言：

> ……傳聞豹房內添蓋房屋，又聞豎立三幡竿，似有創立寺宇之意。臣等竊念，寺觀乃異端之教，聖主之所必禁，……自古及今，並無禁中創造寺觀事例。……況番僧等往來混雜，……而財用之費耗，軍民之困苦，又不足言矣，……疏入，不報。[126]

吏部尚書楊一清也上諫：「陛下每月視朝不過一二……竊聞龍輿常幸豹房，駐宿累日。……。近歲講習甫臨，則聞報罷，勸講之官殆爲虛設。」面對眾臣的勸誡，武宗竟批答曰：「朕已知之矣。」[127] 隨即又增建豹房，可見明武宗疏於朝政，且對於顧命大臣的建言置之不理。搬遷至「豹房」以後，除了出外南征北討、遊幸玩樂，所有歲月都在豹房度過。因此，在豹房中的一切應是檢驗正德皇帝其人面貌之出發點。

「豹房」除了如李東陽言「番僧等往來混雜」，文獻中也記載有「武宗其豹房實多回人，……回人慫恿之」。[128] 此外，明武宗的寵臣中亦不乏回人：「正德間，回回

124《明史》卷十六，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97 本，頁 180。

125「豹房」本為蓄豹馴豹之處，明代永樂宣德以來各朝皆有沿襲，但武宗時規模最大，蓋杰民認為明武宗所建「豹房」之主要作用，是作為他的軍事總部和行政中心。見蓋杰民，〈明武宗與豹房〉，頁 12-19。

126《明武宗實錄》卷七十二，頁 1592。正德六年二月己亥日。

127《明武宗實錄》卷八十七，頁 2232。正德七年五月辛酉日。

128 俞正燮，《癸巳存稿》，收入徐德明、吳平主編，《清代學術筆記叢刊》40，頁 132-133。

人於永上言，高麗女白皙而美，大勝中國。因并取色目侯伯及達官女人入內。」[129] 另外哈密歸附的回回寫亦虎仙與其子米爾馬黑木、女婿火者馬黑木、姪婿米爾馬黑麻均在武宗左右，且「賜國姓，受錦衣指揮，護駕南征」。[130]

前文提及明武宗時期來華的阿里．阿克巴爾所撰《中國紀行》一書，[131] 也有說明中國皇帝對穆斯林的禮遇：

> 皇帝在金龍寶座裡就位以後，等候在屏門外的文武官員和從世界各地來的使節才得到許可進入殿內。他們迅速按等級集合進宮，每個人有固定的位置。從地球這邊，也就是從穆斯林國家來的人比其他人得到優先照顧。他們站在離皇帝兩三步遠的地方。穆斯林的身份比其他人都高，穆斯林以下的是西藏人，然後是韃靼人，其次是維吾爾人，再其次是烏吉德和朱爾吉特人，在這些人之後還有各種不同的印度人。[132]

《中國紀行》的作者身為穆斯林，也許會對穆斯林備受禮遇的情況加以誇飾，但正德朝皇宮中的確也充斥著番僧，即西藏的喇嘛僧人，與引文雷同，仍有參考價值。除此之外，明代統治者鼓勵周邊各國朝貢，對明代政府而言，這是對西域各國的控制，對西域各國而言，與明代朝貢往來也是一種貿易的經濟行為，能從中獲利，如永樂二十二年（1424）十二月丙午，禮科給事中黃驥言：「西域使客，多是賈胡。假進貢之名，借有司之力，以營其司。」[133] 在正德年間，對於回人寬容到達了顛峰，明人嚴從簡《殊域周咨錄》記載，嘉靖年間禮部尚書汪浚對於當時周邊夷

---

129 沈德符撰，《萬曆野獲編》，卷三〈帝王娶外國女〉，頁 74。

130 邱樹森，〈明武宗與明代回回人〉，頁 43。

131《中國紀行》是阿里・阿克巴爾在奧斯曼帝國的君士坦丁堡由波斯文（夾雜東突厥文）寫成的作品。原本阿里・阿克巴爾要將此書呈獻土耳其蘇丹王賽利姆一世（Salim I，1467-1520，在位期間 1512-1520），不料完書後，賽利姆一世意外過世，於是阿里・阿克巴爾將《中國紀行》獻給在他之後嗣位的蘇賚曼・沙。見阿里・阿克巴爾著、張至善編，《中國紀行》，頁 7-9，書前編者張至善序。阿里・阿克巴爾《中國紀行》除了張至善寫有譯本，另有耿昇譯本，筆者認為張至善譯本與耿昇譯本內容大致相同，但略有些微差異。今引述張至善譯之《中國紀行》內文時，將會在註釋中列出耿昇譯本內容，以供參酌比較。見阿里・瑪扎海里著、耿昇譯，《絲綢之路：中國—波斯文化交流史》。

132 此段耿昇則譯為：「一旦當皇帝在龍座上就座後，才讓大批士兵、官吏和來自世界所有地區的使臣進入，他們按其級別匆匆忙忙地依次進入那裏，前往為他們指定的座位上就位。那些來自我們地區（也就是伊斯蘭世界）的使臣們始終都被安置在其他所有使臣之前，也就是說位於距皇帝僅有三步遠的地方。在他們看來，伊斯蘭教的地位該多麼重要啊！他們繼穆斯林使節之後又安排了吐蕃的使節，在吐蕃人之後便是蒙古（喀爾瑪克）使節，再往後是吾畏兒使節，繼他們之後，又是通古斯和女真（滿族）使臣。再向後是一批批佛教諸民族（日本、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亞和印度）的使臣。」見阿里・瑪扎海里著、耿昇譯，《絲綢之路：中國—波斯文化交流史》，頁 208-209。

133《明仁宗實錄》卷五，頁 160。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壬寅朔日。

國朝貢氾濫的情況，向世宗上疏：

> 正德年間容令各處回夷在館四五年住歇，恣意妄為，驕縱特甚，欽蒙皇上御極之初，盡將各犯拏問發遣。今各夷進貢起送，猶不知戒，伴送人員不能鈐束，在途遷延隔歲，日費廩給，先到京者日費下程，等候同賞。[134]

明代為了絡繹不絕的朝貢者設闢了「會同館」，除免費辦理貢使吃住事務、提供看病吃藥服務。還得承辦貢使附帶的方物與私貨兩類，以及對外國朝貢貿易的賞賜，另外也負責上報貢使酗酒鬧事及犯罪情形，而護送貢使回還之事務以及路費之給予，也在會同館的職掌之內。[135] 這裡提到正德年間，明武宗甚至准許回回人「在館四五年住歇」，可以想見，回回人特別蒙受明武宗恩寵。此外，明朝政府為朝貢穆斯林設有通事，即翻譯人員，[136] 在明中後期，雖然政府對貢使人數、次數多有限制，但接待規格未曾降低，而且宮廷有許多穆斯林太監專門為貢使飲食起居服務。《中國紀行》中甚至敘述外國使節的餐廳分設「穆斯林席」與「非穆斯林席」，且由不同廚房供應，[137] 說明正德皇帝自始至終都看重中亞穆斯林的朝貢貿易。況且，明代時「西域回回」入居中國內地是十分頻繁的現象，從洪武到正德間逐漸達到高潮，但到嘉靖以後卻較為減少，[138] 這也或許可以作為嘉靖朝以後裝飾有回回文的官窯瓷器頓時幾乎絕跡的旁證。

此外，明武宗朱厚照對西北這塊地土有特別的情感與留戀，他一到達北邊的邊防重鎮宣府，就營建鎮國府成「第二豹房」，並且命令北京把所有的重要奏章都送到這裡才能核准，就連應州之戰勝後，還常藉口巡視北防，不止一次到西北遊興：

> 上復北幸。……，上度居庸關，歷懷來保安諸城堡，遂駐蹕宣府。初江彬勸上于宣府治行在，越歲乃成，糜費不可計，復輦豹房所儲諸珍寶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上甚樂焉；每稱曰：「家裡」。還京後，數數念之不置。彬亦欲專寵，俾諸幸臣不得近，數導上出，及再度居庸關，仍戒守者毋令京朝官出關；蓋上厭大內，初以豹房為家，至是更以宣府為家矣。[139]

如文獻所示，明武宗對西北宣府念念不忘，更甚於「豹房」。武宗寵幸回人，

---

134 嚴從簡著、余思黎點校，《殊域周咨錄》，頁 489。
135 魏華仙，〈論明代會同館與對外朝貢貿易〉，頁 17-18。
136 丁明俊，〈明朝與中亞穆斯林貢貿關係探析〉，頁 33。
137 阿里・阿克巴爾著、張至善編，《中國紀行》，頁 95。
138 邱樹森主編，《中國回族史》（上），頁 351。
139 毛奇齡，《明武宗外紀》，收入張溟等著，《明武宗外紀》，頁 21。

尤其是西北地區的回人，並且特別喜愛遊幸西北地區，從對朝貢穆斯林的特別待遇中還得以窺知正德對西北回族特別寵幸。由此可見，他應該受到西北回族的文化洗禮甚深。

然而，西北回族對於明武宗有何別於其它地區回族的影響？於此應就回族於中國的分佈進行補充論述。伊斯蘭教傳到中國已久，但依據不同的途徑與當地文化的薰陶，形成三種不同類型的文化圈：一、以漢儒文化爲重、伊斯蘭文化爲輕的「東南沿海回族社區」；二、以伊斯蘭文化爲重、漢儒文化爲輕的「西北回族社區」；三、漢伊並重的「雲南回族地區」。[140] 而西北回族社區因爲地近中亞、西亞，自古爲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又鄰近世界最大的穆斯林民族分佈區，因此形成了回回民族最大且最重要的聚居地，先是胡登洲（1522-1597）開經堂教育先河，且蘇非派亦爲西北回族社區最主要的信仰特色。[141] 除了典籍可見的文字資料，如同前文曾提及正德官窯一件〈描紅回文盤〉（附錄 66），盤壁節錄有波斯詩人薩迪的名著《古洛斯坦》，而《古洛斯坦》在明代中葉以後，甚至被列爲西北穆斯林經堂教育的主要讀本之一。官窯瓷器上洋溢的西北回族風情，實是有跡可尋。

儘管周圍環繞回人，明武宗本人也好遊興西北，他對伊斯蘭教的觀感又如何？依據《正教真詮》載云：「武宗皇帝評論諸教，謂侍臣曰：『……諸教之道，皆各執一偏。惟清真認主之教，深原於正理。此所以垂教萬世，與天壤久也。』」[142] 指出正德皇帝看重伊斯蘭教。此外，伊斯蘭教徒不食豬肉，明武宗的諭令中甚至有〈禁宰豬令〉：

> 養豕之家，易賣宰殺，固系尋常。但當爵本命，既而又姓，雖然字異，實乃音同。況兼食之，隨生瘡疾，宜當禁革。如若故違，本犯並連當房家小，發遣極邊衛永遠充軍。[143]

文中說明：因皇帝乃辛亥年生，屬豬，又明代國姓爲「朱」，因其諧音而忌諱，甚至下令違者重罰，並要孔廟「丁祀」時祭品中的豬頭都以羊頭代替。正德十五年（1520）三月十三日，正德朝臣楊廷和等上奏「請免禁殺豬疏」，北京禮部

---

140 馬金寶，〈從三種典型區域發展類型看回族文化〉，收入西安市伊斯蘭文化研究會編《伊斯蘭文化研究》，頁 310；Lipman, Jonathan Neaman, *Familiar Strangers: A History of Muslims in Northwest China*.

141 馬金寶，〈從三種典型區域發展類型看回族文化〉，頁 308-329。

142 馬注、王岱與，《清真指南・正教真銓》，頁 41-42。

143 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四，禁宰犬豕，頁 23。

也請求弛禁，最後武宗只好勉為同意。[144] 但也有一說，

> 武宗通梵語，其豹房實多回人，又未有元嗣。孫真人《千金方》言，豬肉久食，令人少子。《食忌》云，豬腦食之損男子陰道，臨房不能行事。蓋武宗有所感，回人慫恿之，托之國姓朱，武宗亥生，故有鈞帖。回人不欲見扈從者持豬肉，鈞帖止行一路。[145]

久無子嗣的明武宗因聽信回人之言，認為食豬肉豬腦有礙房中術，因而從此不食豬，也禁止全國百姓吃豬，而「朱」姓、屬「豬」之說僅為藉口。此「禁豬肉說」成為以往論者主張明武宗為穆斯林的依據。不過從史料得知，明武宗的確也是藏傳佛教的虔誠信奉者，他曾在豹房中建佛寺，終日與番僧往來，還自稱「大慶法王」，[146] 甚至有「迎活佛」之舉。[147] 然而，《中國紀行》中載有這樣的內容：

> 他父親死後繼承了皇位。有一天他在夢中見到了穆罕默德，接受了伊斯蘭教義，他醒後看見屋裡牆壁上刻著綠色的證詞。[148]
>
> 在汗八里城的郊區，中國皇帝建造了一座清真寺，主要作為他自己祈禱之

144《明武宗實錄》記有大學士楊廷和等言：「近日傳聞直隸及山東鎮巡等官，奉聖旨禁地方人等不許養豕及易賣宰殺，違者發極邊衛永遠充軍，遠近流傳，旬日之間，村市居民，畏避重罪，隨所養之豕盡行殺賣，減價賤售，甚至將小豕掘地埋棄者有之，人心惶駭，莫測其由……伏望皇上尚察物情……曉諭各處地方人等各安生業，毋致驚疑……。」文見《明武宗實錄》，卷一八三，頁 3536。正德十五年二月戊辰日。

145 俞正燮，《癸巳存稿》，收入徐德明、吳平主編，《清代學術筆記叢刊》40，頁 132-133。最早是日本學者桑原騭藏引用《明武宗實錄》與俞正燮此條文獻提出明武宗不吃豬肉，他也指出清傅維麟的《明書》（〈畿輔叢書本〉）卷十二《武宗本紀》之正德十四年（1519）記有：「九月，上次保定（河北省清苑縣）禁民間畜豬，著為令。」以及明末沈德符《野獲編》卷「兵部左侍郎王，抄奉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鈞帖：照得養豕宰豬，固尋常通事。但當爵本命，又姓字異音同；況食之隨生瘡疾。深為未便。為此省諭地方，除牛羊等不禁外即將豕牲不許喂養及易賣宰殺。如若故違，本犯并當房家小發極邊永遠充軍。」文見桑原騭藏著，馮攸譯，《中國阿剌伯海上交通史》，頁 83-85。

146「（六月十六日）命鑄大慶法王西天覺道圓明自在大定慧佛金印，兼給誥命。大慶法王，蓋上所自命也。」，「番僧乞田百頃，為法王下院，中旨下部稱大慶法王，與聖旨竝。帝好佛，自稱大慶法王，……（禮部尚書傅）珪佯不知，執奏：『孰為大慶法王，敢與至尊並書，大不敬！田亦竟止，詔勿問。』」分別見《明武宗實錄》，卷六十四，頁 1407。正德五年六月庚子日與《明史》卷一八四，《傅珪傳》，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00 本，頁 22。

147 命司設太監劉允往烏思藏賚送番供等物，時左右近幸言：「西域胡僧有能知三生者，土人謂之『活佛』。遂……遣允乘傳往迎之，以珠琲為幡幢，黃金為七供，賜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饋賜以巨萬計，內庫黃金為之一匱，……」見《明武宗實錄》，卷一三一，頁 2611。正德十年十一月己酉日。

148 阿里・阿克巴爾著、張至善編，《中國紀行》，頁 95。耿昇譯本紀錄：「自從我們回國之後，便聽說（經從遠東返回的商人介紹），這位尊貴和慷慨的太子剛剛繼父位而登基。他在夢中夢見了先知們的真主（馬哈麻，即穆罕默德），他醒來之後就能夠閱讀用綠色方塊字抄在牆上的伊斯蘭教的信經。當他發現這一切之後，便令人傳來了北京的伊斯蘭教學者之一郁虛白並經他手而受歸化。」兩譯本對照大意略同。見阿里・瑪扎海里著、耿昇譯，《絲綢之路：中國—波斯文化交流史》，頁 245。

> 地。每年在對犯人處決斬首前，他都來到這座清真寺。這裡沒有甚麼神像。在朝麥加方向的牆上刻有可蘭經和真主的名字，有回文和中文的解釋。[149]

儘管阿里．阿克巴爾身爲穆斯林，其相關記載不知可信度如何。但對照中國的文獻，也同樣透露正德皇帝與伊斯蘭教關係的玄機。《國榷》中有：「時上好異，習胡語，自名忽必列，習回回食，自名沙吉敖爛。」[150] 據卓鴻澤研究，「沙吉（Shaykh）敖爛（Alam）」一詞，以波斯語譯出爲「奴僕少年的教長」，即表示明武宗不只是佛教秘宗的金剛上師，也自稱爲蘇非教派的教長。[151] 事實上，就算明武宗身兼「蘇非長老」與「大慶法王」也未必衝突，因明人信仰佛回混雜的情況非常普遍。如前述提及弘覺寺塔基地宮，此塔建於宣德八年，該地宮是一個融佛教與伊斯蘭教喪葬制度爲一體的墳墓，[152] 其中鎏金喇嘛塔座上後刻有「佛弟子御用監太監李福善奉施」，這名太監「李福善」最近被認爲是明成祖永樂時「三寶太監」鄭和，弘覺寺塔地基即是鄭和埋骨之一處。該文也提出鄭和雖是回族穆斯林，但他的行爲中卻透露崇信佛教的痕跡。[153] 當然也有李福善非鄭和的見解，[154] 但無論奉獻此塔之人爲誰，塔中「佛回並存」的痕跡卻是事實，也顯示墓主的雙重信仰，[155] 巧合的是，阿里．阿克巴爾也爲正史未載明武宗信奉伊斯蘭教的原因下了詮釋：

> 中國皇帝自認為是真主的崇拜者，並且相信釋迦牟尼的教義。在他們的經文中說，賢哲者有宗教信仰，而偶像崇拜則是無知的事。……從皇帝的某些行動看，他已轉變成信奉伊斯蘭教了，然而由於害怕喪失權力，他不能對此公開宣布。這是因為他的國家風俗和法規所規定的。[156]

---

149 阿里．阿克巴爾著、張至善編，《中國紀行》，頁 41。耿昇譯本則記錄：「可汗令人為他本人在北京（汗八里）城外修建了一座清真寺（原文如此），他每年在處決殺人犯的前夕都駕幸那裏。以便在那裏祭天。他令人在該清真寺內與默伽（麥加）相反方向的牆壁上用穆斯林文字和漢文方塊字寫下了《古蘭經》中的幾節經文和安拉最美的名字。」見阿里．瑪扎海里著、耿昇譯，《絲綢之路：中國—波斯文化交流史》，頁 157-158。

150 談遷，《國榷》第五冊，頁 3077。

151 在波斯文中，「شيخ」（Shaykh）一詞的確與文獻中的「沙吉」讀音十分接近，這個字也有「首領」、「（蘇非派）長老」的意思。見卓鴻澤，〈正德的番、回傾向——大明皇帝對異族宗教的追求〉，頁 428。

152 葛曉康，〈南京牛首山弘覺寺塔地宮初探〉，頁 110-116。

153 林松，〈從回回民族特殊心理意識綜觀鄭和宗教信仰的複雜性〉，頁 94-106。

154 李蔚然，〈南京牛首山弘覺寺塔及其地宮出土文物綜述〉，頁 70-72。

155 葛曉康，〈南京牛首山弘覺寺塔地宮初探〉，頁 110-116。

156 阿里．阿克巴爾著、張至善編，《中國紀行》，頁 44-45。耿昇譯本則描述：「雖然可汗根據由佛陀釋迦牟尼創立的教派而自稱是獨神主義者，但他實際上仍為哲學宗教的信徒。我們甚至覺得他們的書籍都抨擊多神主義，認為它是『異端學說者』們所特有的一大堆謬誤。……該

由此可見，明武宗極有可能在信仰生活上進行「佛回雙修」。又《國榷》中的文獻明確提到明武宗自比蘇非派的長老，而明武宗常巡幸的西北地區恰是明代蘇非流行之地。再者，前述蘇非派的儀式用具：「爐瓶盒三設」，在正德官窯中是常見器形。其中屬「盒」器形的〈青花阿拉伯文圓盒〉（圖 19-20，附錄 30-31），器蓋側面書寫的波斯文譯爲：「噢！那些聽我話的人，現在輪到要來看（而學習）我的表現。」其文字涵義與蘇非派主張內心省悟以及體驗，並且注重執行的特徵不謀而合。[157] 另外，蘇非者的修行看似不修邊幅，實際上卻表示已經拋卻一切，只著重和真主阿拉之間的直向交通。法國吉美博物館與美國費城藝術博物館各藏有一件〈青花波斯文六角燭臺〉（圖 49，附錄 33-34），由波斯文寫成的六面開光文字書寫變形，內容勉強可合讀爲：「خراب میگشتم تا بگنج فروشدم ناگاه کرد کدج」，可 能漢譯爲：「我爲了追求他（阿拉），已經進入像喝醉的修行，還要（希望）突然（有恩惠能）付上寶藏才可得到。」可見從明武宗的官窯瓷器反映的訊息恰可和蘇非派的宗教儀式與哲學思想相互印證，且與文獻所載有所呼應。根據學界研究，蘇非在十三、十四世紀已經傳入中國，但是十七世紀下半葉才在中國造成大影響。[158] 但實物證據可證明明武宗在環境氛圍的促使下已經接觸了蘇非信仰。

（三）明武宗與回回文裝飾之淵源

然而，爲何明武宗特別以官窯上的「文字裝飾」來突顯他的信仰？這可能與明武宗熱愛語言學習有關。史載明武宗「佛經梵語無不通曉」，[159] 且一馬姓孕婦曾經「以善騎射、解胡樂達語遂得幸」。[160] 關於明代所謂「回回文」之學習，《武宗實錄》中有這樣的記載：

> 甘肅鎮守太監王欣奉 上旨購通漢語，能書回回、達子、西番，年十五以

皇帝（成化，1405-1487）的某些所作所為也可以使人相信他秘密地遵循伊斯蘭教規，但他不敢在大庭廣眾之下公開宣傳這一宗教，因為他害怕這樣作會引起危及其帝國和平的某些騷亂。該帝國始終都是根據異教的禮儀來治理時。」兩譯本同樣記載皇帝有「佛回雙修」的狀況，見阿里・瑪扎海里著、耿昇譯，《絲綢之路：中國—波斯文化交流史》，頁 160。

157 伊斯蘭教中的蘇非派傳入中國境內，分佈於甘寧青地區之「四大門宦」中的「虎非耶」與「哲合忍耶」兩門宦，都主張「教乘」與「道乘」並重，即為伊斯蘭教的基本信仰和主要經典，並且也要進行道乘修持。見楊懷中、余振貴主編，《伊斯蘭教與中國文化》，頁 578-580。

158 林長寬，《中國回教之發展及其運動》，頁 77。

159「上佛經梵語無不通曉，寵臣誘以事佛，故（番僧）星吉等皆得幸近。」出自《明武宗實錄》，卷六十四，頁 1397。正德五年六月壬辰日。

160 原文作「初，昂女弟美艷，江彬白之上，實已適華指揮有娠矣。上令中使取之至豹房，以善騎射、解胡樂達語遂得幸。」文中「解胡樂達語」一詞，應是回回樂曲與蒙古文字。文見《明武宗實錄》，卷一四一，頁 2783。正德十一年九月丙午日。

下者，各二十人，以進，亦罷遣給主。[161]

此條資料顯示明武宗曾經招「能書回回語」的少年進宮。[162] 以宮中圍繞眾多回人、加以「回回館」存在的情況，正德皇帝本身的確有學習回回文的優良環境。另外，何喬遠《名山藏》〈王享記〉東南夷滿剌加國條記有：「佛郎機有使者亞三，能通番漢，賄江彬，薦之武宗，從巡幸。武宗見亞三，時學其語以爲樂。」[163] 可見明武宗在諸多方面展現對語言學習的興趣。

《清真先正言行略．陳大策傳》也稱：「武宗留心諸教，嘗訪以天方教道。大策遂進呈天經，……帝因于回經三十卷微言妙義靡不貫通。」[164] 然而，由於穆斯林將阿拉伯文寫成的《古蘭經》視爲神聖經典，即便是不懂阿拉伯文的穆斯林也必須以阿拉伯文朗誦《古蘭經》，如明末清初回族的伊斯蘭教學者劉智（1664-1730）所言：「天經聖諭，皆本經文妙，無母藻飾，兼用漢譯，或難符合，勉勵爲之，致意云爾。」[165] 因此在清代中葉回族經師馬德新首次譯出中文版《古蘭經》以前，[166] 由阿拉伯文寫成的《古蘭經》並無漢譯本。若上引文獻所載無誤，明武宗對之「微言妙義靡不貫通」的「回經」，應是由阿拉伯文寫成的《古蘭經》，此可證明武宗本人至少通曉回文，因此在正德皇帝官窯的個案當中，熾烈的伊斯蘭風與充斥回人的宮廷，不單純是表示對異國文化的兼容並蓄，明武宗選擇以「回文」表達在日常使用的瓷器上，恐怕還蘊含了明武宗頗得意自身熟悉異國的語言，以及對異國文化的掌握。

此外日本私人收藏與中國首都博物館各藏有一件款銘「大明嘉靖年製」的阿拉伯文青花筆盒，不論是造形、紋飾以及阿拉伯文的樣貌上，都與正德年間的作品相似。然而，《明史》食貨志記載：

自弘治以來、燒造未完者、三十余萬器。嘉靖初遣中官督之。給事中陳皋

161《明武宗實錄》，卷一九七，頁 3688。正德十六年三月庚午日。

162 此論點由卓鴻澤教授率先提出，見卓鴻澤，〈“演揲兒”為回鶻語考辯——兼論番教、回教與元、明大內秘術〉（待刊稿）。

163 何喬遠撰，《名山藏》（《續修四庫全書》427 冊，據明崇禎刻本影印），〈王享記〉，〈東南夷滿剌加國〉，頁 635。

164《皇明世法錄》卷八十一，轉引自《中國伊斯蘭教史參考資料選編》上冊，頁 151、222。

165 丁明仁，《伊斯蘭文化在中國》，頁 29。

166 劉智曾漢譯有《古蘭經》的三個短章，但沒把翻譯整本《古蘭經》列入計畫。進行漢文通譯《古蘭經》最早的是回族經師馬德新（1791-1872），但據傳原稿毀於火災，倖存部分命為《寶命真經直解》。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起，漢文通譯《古蘭經》才全面展開陸續出版；見丁明仁，《伊斯蘭文化在中國》，頁 29。

> 謨言、其大為民害、請罷之、帝不聽。十六年新作七陵祭器。三十七年遣官之江西、造內殿醮壇瓷器三万。後添設饒州通判、專管御器廠燒造。[167]

可以想見，正德朝時筆盒核配的數量尚未燒完，待嘉靖朝重新燒製後，只好書寫嘉靖款。因此，帶有「大明嘉靖年製」的阿拉伯文青花筆盒，或許可以視爲「前朝遺留的正德樣式」。[168]

再者，正德官窯這種在瓷器上以阿拉伯文字裝飾的現象，還可以和伊斯蘭世界作更深的聯繫。《古蘭經》第五章第九十句有：「信道的人們啊！飲酒、賭博、拜像、求簽，只是一種穢行，只是惡魔的行爲，故當遠離，以便你們成功。」[169]《古蘭經》中明示禁拜偶像，因此在伊斯蘭藝術中，除了阿拉貝斯克 (Arabesque) 的圖樣，[170] 阿拉伯文字也成了裝飾應用的重要一環。伊斯蘭教對阿拉伯語相當重視，是因爲《古蘭經》乃以阿拉伯語頒佈，且《古蘭經》第九十六章有「你應當宣讀，你的主是最尊嚴的，他曾教人用筆寫字。」[171] 再來是阿拉伯文字本身形態優美，曲線富柔軟性與抽象性，又以其不同粗細與角度變化，構成時而流麗、時而厚重的風貌，因而成爲伊斯蘭藝術的重要裝飾，如建築、細密畫、工藝作品上都大量地運用回回文作裝飾。

事實上，中國陶瓷器除了用以紀年或明記工匠或持有者姓名、作品用途者，以文字作爲裝飾，最早見於長沙窯，其便是於釉下以褐彩書寫詩文。而除了以中國文字作爲裝飾，1980 年江蘇揚州蕭家山出土的阿拉伯文「阿拉真偉大」〈唐長沙窯青釉綠彩穿帶壺〉，[172] 與其說是其書寫阿拉伯文而帶有伊斯蘭風，倒不如將「在瓷器上書寫文字作裝飾」的現象也歸於伊斯蘭陶瓷影響。且長沙窯器在伊斯蘭地區出土頻仍，也許是伊斯蘭市場因素的反映。於陶瓷器上大量以文字作爲裝飾的另一突出點，即是磁州窯製品；而磁州窯作品更是集合了「文字」加上「鉤文字輪廓」的雙重伊斯蘭因素，且磁州窯作品常見黑底剔花的表現，與同時期伊斯蘭陶瓷有雷

---

167 李洵校注，《明史食貨志校注》，頁 285。

168 對於嘉靖也生產阿拉伯文筆盒的解釋，由匿名審查者之二建議，特此申謝。

169《中文譯解古蘭經》，頁 91。

170「阿拉貝斯克」即樣式化的蔓草紋與草的裝飾、在伊斯蘭美術中始終擔任重要的位置。這也是伊斯蘭美術之所以屢屢被稱為裝飾藝術的原因。詳見福井泰民，〈アラベスク模様の世界〉，頁 9-18。

171《中文譯解古蘭經》，頁 597。

172 朱江，〈揚州出土的唐代阿拉伯文背水瓷壺〉，頁 95。

同。[173] 繼唐代長沙窯、宋代磁州窯之後，中國陶瓷史上第三個大量以文字作爲裝飾的作品，即本文討論的中心——正德官窯作品。筆者以爲這是陶瓷器上以文字表現伊斯蘭風格的高峰，除了書寫文字爲伊斯蘭地區所使用的波斯文與阿拉伯文，書寫內容也大多與伊斯蘭教有關；尤其是文字的繪飾技法，許多文字書寫方式是先鉤出輪廓，再塡釉彩於其中，尤其是使用開光的組合更彰顯了正德官窯濃厚的伊斯蘭趣味。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福建民窯之一——漳州窯系作品，也出現了書飾中文字的狀況，且以開光將單句字字分隔——如（圖 50）所示的，四個圓形開光分別書寫「忠」、「孝」、「廉」、「節」，分置於盤心四面，也有〈帆船紋盤〉之盤心四方寫有天干地支（圖 51），這種在陶瓷器上以開光分隔文字的作風，應該是源於正德官窯的影響。此外，在開光內書置阿拉伯文以及漢字的瓷器，很可能是分別銷往伊斯蘭世界與漢字文化圈的貿易瓷。筆者見有一件埃及福斯塔特 (Fustat) 出土破片（圖 52），應與十七世紀漳州窯〈青花山水文字紋碗〉（圖 53）爲同型作品，可見漳州窯生產體系的確曾爲伊斯蘭地區特別設計帶有伊斯蘭要素的作品。而漳州窯中裝飾漢文字的作品是否專爲漢文化圈所設計，則要仰賴今後統計各地遺留的貿易痕跡與沈船資料進行確認。

但自正德官窯之後，於官窯上裝飾回回文甚至外國文字款幾乎不再出現。顯然可見，從正德到嘉靖、隆慶、萬曆官窯，在風格上有明顯的大變異，特別從此時伊斯蘭要素開始消褪，可以從幾個方面探究其原因。

從內部狀況來看，嘉靖初年之「大禮議」事件，造成君臣間的嚴重衝突，也可見嘉靖前期明世宗欲積極進取，改革正德朝的諸多弊端。前述禮部尚書汪浚曾向世宗提出周邊夷國朝貢之弊端在正德朝尤烈，[174] 嘉靖年間對於回回的進貢則尤其嚴格；如嘉靖十三年土魯番諸回夷到邊境求入貢，邊臣則言：「回夷入貢以三年，五年爲期，系累朝訂例，今土魯番舊歲來貢者，尙未還國，今又違例要求，不可許。」[175] 十九年土魯番又違例進貢，明朝廷則「撫按諭阻，請權駐內地自食，以待貢期許焉」。[176] 由此可見，相對於正德朝對回回使者的寬容與優惠，在嘉靖朝已不

173 馬文寬，〈伊朗塞爾柱克伊斯蘭陶器及與中國瓷器的關係〉，頁 171-172。
174 嚴從簡撰；余思黎點校，《殊域周咨錄》，頁 489。
175《明世宗實錄》，卷一六四，頁 3619。嘉靖十三年六月丙申朔日。
176《明世宗實錄》，卷二三九，頁 4853。嘉靖十九年七月庚寅朔日。

復見。另外，從洪武朝開始不斷有「西域回回」內遷中原，後經永樂至正德，「西域回回」內遷逐漸達到高潮，嘉靖以後，「西域回回」內遷則逐漸平靜。[177] 世宗有鑑於武宗因番僧而延宕國事，初登位即黜傳升僧道教坊三百五十餘員，[178] 又誅大能仁寺妖僧，並毀佛像，刮金屑一千三百餘兩。[179] 然而世宗本人卻崇尚神道，並在宮中屢建齋醮，好神仙不老之術。這些也反映在嘉靖官窯中多神仙道教題材（圖54），在官窯瓷器上並沒有出現明顯的伊斯蘭要素。

此外，嘉靖隆慶時期北方戰事嚴重，隆慶五年（1571）穆宗封主要威脅「北虜」俺答爲順義王，另封其餘蒙古諸首領不同官號，才使得北方亂事趨於緩和。然而萬曆二十年（1592）後又有日本豐臣秀吉侵略朝鮮之戰，明朝廷派兵援助，雖然最後宣布告捷，但緊接著又有西班牙、荷蘭人的入侵。嘉靖年間，日本進入戰國時期，由於群雄對物產的需求，倭寇在中國沿海走私與掠奪嚴重，[180] 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努爾哈赤則在北方建立後金，以「七大恨」起兵反明。後雖經崇禎皇帝的力圖振作，日落黃昏的大明王朝在四面環敵的情況下，視點無法僅停留在西北回回，伊斯蘭要素在官窯瓷器上也逐漸凋零。

結　　語

本文透過考察現存正德官窯實物中飾有回回文的瓷器，並釋讀回回文之內容，從中釐清荒唐皇帝明武宗諸多神秘面貌之一隅，其結論可概如下：

以往學者已就明代宮廷繪畫中的帝王品味進行研究。[181] 本文則以正德官窯爲案例，觀察明代官窯的品味來源。筆者發現在書寫回回文的作品中，不論是文字內容抑或其「漢形制伊斯蘭文物」的器式，皆與文獻中所記載的武宗之蘇非信仰相扣合；而正德官窯中分別以小經文字與八思巴文書寫款識的現象，也顯示明武宗個人信仰與愛好反映在官窯瓷器之上。就正德官窯而言，帝王確實在官窯風格中佔有主導地位。

此外，伊斯蘭教在中國境內流傳的過程中，確有吸收、融合漢地文化的現象。

177 邱樹森主編，《中國回族史》（上），頁 351。
178《明世宗實錄》，卷一，頁 35。嘉靖十六年四月乙亥日。
179《明世宗實錄》，卷二十六，頁 733-735。嘉靖二年閏四月辛丑朔日。
180 張德信，〈淺析明代的倭寇與海防建設—兼論明代中日關係的走向—〉，頁 232-245。
181 石守謙，〈明代繪畫中的帝王品味〉，頁 225-291。

本文透過對正德官窯回回文器皿的研究，可以發現明武宗竟以帝王之尊，親自參與並投入伊斯蘭教信仰，而且還特別傾向於西北傳入的蘇非教派。經由翻譯正德官窯中的回回文，不僅可為此一文化現象補充「第一手文獻」，並且可就器形樣式觀察，得知「漢形制伊斯蘭文物」確已經被融入官窯的生產體系當中。正德官窯飾有回回文字的作品，可說是於明代中期官方伊斯蘭宗教文化的代表產物。

不止如此，明萬曆十七年王世懋《窺天外乘》有段關於青花顏料的記載：「回青者，出外國。正德間，大璫鎮雲南，得之，以煉石為僞寶。其價，初倍黃金，已知其可燒窯器，用之果佳。」[182] 說明另一中國境內回族地區——雲南，透過回青在正德時期又有了一次接觸。此外，中國西北側的帖木耳朝（Timur，1370-1507），觀察能作為歷史輔證的細密畫或絹畫中，可見蘇丹的宮殿陳列有中國青花等作品（圖 55），其花鳥背景也有中國繪畫的影響痕跡。[183] 可以想見，在同時期東方世界的正德王朝，明武宗身邊圍繞著回人、回妃，以及回回文器皿，相對於帖木耳蘇丹的中國情調，正德皇帝或許也過著充滿伊斯蘭氣氛的生活。

〔附記〕本文內容改寫自筆者之碩士論文《明代官窯的伊斯蘭裝飾要素——以正德（1506-1521）官窯所見阿拉伯文與波斯文紋飾為例》（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2008 年 4 月 11 日），感謝指導教授謝明良特聘教授及口試委員陳葆真教授、器物處蔡玫芬處長對於論文的指正教示，以及施靜菲教授與王淑津女士給予筆者的諸多啟發。文中大量阿拉伯文與波斯文釋讀，承蒙方志成先生、顧朋先生慷慨提供見解，並花費許多私人時間與筆者往復討論斟酌對譯後之最適切文意，但若翻譯有所錯誤，由本人承擔文責。此外，圖書文獻處周維強先生對本文改寫架構之建議，以及《故宮學術季刊》兩位匿名審稿人提供的寶貴意見，在此謹致謝忱。

182 王世懋，《窺天外乘》，頁 2236。

183 根據日本學者杉村棟的說法，他認為此畫明顯具有中國花鳥畫與傳統圖案的特色，當是受到中國繪畫的影響，見杉村棟編輯，《世界美術大全集 東洋編 第 17 卷 イスラーム》，頁 421，作品 157 之杉村棟解說。

附錄 正德官窯回回文瓷器釋義表

編號	器形	a品名[184] b尺寸（單位：cm） c銘款	釋文	藏地與圖片出處
1	筆架	a 青花靈芝紋筆架 b 高 11.7 長 22.5 寬 5 c 大明正德年製	خامة，波斯文「筆」之意，即用來寫阿拉伯書法的竹子筆。另面：دان，波斯文，為後綴詞，意思是「……的位置」。 兩面合譯為「筆的位置」，即「筆架」。	大英博物館 (16)
2	筆架	a 青花回字筆架 b 長 22.5 c 大明正德年製	خامة，波斯文「筆」之意，即用來寫阿拉伯書法的竹子筆。另面：دان，波斯文，為後綴詞，意思是「…… 的位置」。 兩面合譯為「筆的位置」，即「筆架」。	英國大衛德基金會舊藏，現由大英博物館保管 (20)
3	筆架	a 青花山形筆架 b 高 11.8 長 22.3 c 大明正德年製	خامة，波斯文「筆」之意，即用來寫阿拉伯書法的竹子筆。另面：دان，波斯文，為後綴詞，意思是「…… 的位置」。 兩面合譯為「筆的位置」，即「筆架」。	波士頓美術館 (15)
4	筆架	a 青花山形筆架 b 長 22.2 c 大明正德年製	خامة，波斯文「筆」之意，即用來寫阿拉伯書法的竹子筆。另面：دان，波斯文，為後綴詞，意思是「……的位置」。 兩面合譯為「筆的位置」，即「筆架」。	美國大都會美術館 (24)
5	筆架	a 青花波斯文筆架 b 高 11 寬 22 c 大明正德年製	خامة，波斯文「筆」之意，即用來寫阿拉伯書法的竹子筆。另面：دان，波斯文，為後綴詞，意思是「……的位置」。 兩面合譯為「筆的位置」，即「筆架」。	首都博物館 (10)
6	筆架	a 青花波斯文筆架 b 高 11 寬 22 c 大明正德年製	خامة，波斯文「筆」之意，即用來寫阿拉伯書法的竹子筆。另面：دان，波斯文，為後綴詞，意思是「……的位置」。 兩面合譯為「筆的位置」，即「筆架」。	香港藝術館（筆者自攝，請見圖 28）
7	筆架	a 青花靈芝唐草紋筆架 b 高 11.7 長 22.5 寬 5 c 大明正德年製	此面：القلم اقبل 阿拉伯文 另面：من كل شى 阿拉伯文 合譯為：القلم اقبل من كل شى「筆是優於一切的。」	牛津艾胥莫琳博物館[185]
8	筆架	a 青花山形筆架 b 資料不明 c 大明正德年製	此面：القلم اقبل 阿拉伯文 另面：من كل شى 阿拉伯文 合譯為：القلم اقبل من كل شى「筆是優於一切的。」	北京故宮博物院 (2)

184 本附錄表格之回回文所有品名，大多依圖片出處著作之原品名，若筆者有特殊意見，將在註釋中特別說明。

185 Jessica Harrison-Hall 在描述附錄作品 1 時，曾提及相同的筆架除了大英博物館以外，大衛德基金會、大都會美術館、波士頓美術館與牛津艾胥莫琳美術館也有收藏。除了前述附錄已收四博物館藏品，雖然牛津艾胥莫琳美術館所藏青花波斯文筆架圖片未出版，筆者仍蒐羅納入正德作品群。見 Jessica Harrison-Hall, *Ming Ceramics in the British Museum*, pl. 8-3 說明 , p.193.

9	筆架	a 青花五指山形筆架 b 高 13.4 長 20.2 寬 5 c 大明正德年製	此面：القلم اقبل 阿拉伯文 另面：من كل شى 阿拉伯文 合譯為：القلم اقبل من كل شى「筆是優於一切的。」	大英博物館 (16)
10	硯屏	a 青花回字文硯屏 b 高 45.8 c 大明正德年製	開光內文字出自《古蘭經》七十二章〈精靈〉的第十八、十九、二十節。 (18)و ان المساجد لله فلا تدعو مع الله احدا「一切清真寺的，都是真主的，故你們應當祈禱真主，不要祈禱任何物。」 (19)و انه لما قام عبد الله يدعوه كادو يكونون عليه لبدا「當真主的僕人起來祈禱他的時候，他們幾乎群起而攻之。」 (20)قل انما ادعو ربى و لا اشرک به احدا「你說：『我只祈禱我的主，我不以任何物配他。』」	英國大衛德基金會舊藏，現由大英博物館保管 (20)
11	香爐	a 青花波斯文三足香爐 b 高 10.3 c 大明正德年製	六個開光內各有波斯文字，合譯為： آنکه با عطّار می گردد تربت او همی یابد زبوی خود نصیب 直譯：「誰如果受到賣香水的人的教育，他必然會沾染到他自己的味道」。意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雅典貝納基博物館 (17)
12	香爐	a 青花波斯文三足香爐 b 高 10.3 c 大明正德年製	六個開光內各有波斯文字，合譯為： آنکه با عطّار می گردد تربت او همی یابد ز بوی خود نصیب 直譯：「誰如果受到賣香水的人的教育，他必然會沾染到他自己的味道」。意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香港天民樓（筆者自攝，請見圖 17）
13	香爐	a 青花阿拉伯文三足香爐 b 高 12.4 c 大明正德年製	六個開光內之阿拉伯文組合成： انا الحنان فاطلبنى تجدنى「我是仁慈的，所以尋求我就尋見我。」 صلى الىّ لا تقصد سوايى「讚美我！除了我以外不要渴慕他人。」	大英博物館 (16)
14	瓶	a 青花阿拉伯文方瓶[186] b 高 25.4 c 大明正德年製	頸部開光：波斯文 لا لا زنم（？）:「我不斷地拒絕」或「我一直口頭上表達很虔誠的態度」。 器身開光（右）：波斯文 بركنم（？）:「我（把它）連根拔起」或「我（把它）推翻」。 器身開光（左）：波斯文 وجفى دارم（？）:「作壞事情；對不起（人家）。」	牛津艾胥莫琳博物館 (12)

186 原品名為〈花瓶〉，且該圖出處推測文字內容可能是古蘭經阿拉伯文字，見デイジー・リオン＝ゴールドシユミツト（Daisy Lion-Goldschmidt）著、瀨藤瓔子、岩永泰造翻譯，吉田光邦監修，《明の陶磁》，頁 120。

15	瓶	a 青花波斯文四方瓶[187] b 高 26.0 c 資料不詳	器頸圓形開光：波斯文 ای جلال：啊～光輝榮耀的（阿拉） 四方體部分的兩個圓形開光：波斯文 قدرتت：你的力量 بیرون：外面，在～之外。兩字合譯為：قدرتت بیرون 「…… 在你的力量之外 ……」	美國克利夫蘭藝術館 (6)
16	罐	a 青花波斯文方瓶[188] b 高 13.5 口徑 11 c 大明正德年製	圖片所示兩個圓形開光內為波斯文： 此器寫作：قاطلبنی تجدنی，但 قاطلبنی 無義。正確寫法應為 فاطلنی。 兩句合譯為：فاطلنی تجدنی「因此你尋求我必定尋見。」 另面兩開光也是波斯文：اقل لبیک کظیما「沉默地回答。」	大英博物館 (16)
17	瓶	a 青花阿拉伯文長頸瓶 b 資料不詳 c 資料不詳	圖片所示圓形開光內為阿拉伯文：الجلیل 非常有光輝的（阿拉）。	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 (13)
18	瓶	a 青花阿拉伯文長頸瓶 b 資料不詳 c 大明正德年製	因圖片模糊，僅能猜測靠近頸部之圓形開光為：阿拉伯文 قال نبی 意為「先知說」。 圖片之左下圓形開光內為：阿拉伯文，یصل 意為「（他）讚美……」 （文意視後接單字而定）圖片之右下圓形開光圖示不清故無法辨明。	出光美術館 (13)
19	瓶	a 青花阿拉伯文瓶 b 高 24.8 底徑 13.0x9.8 c 大明正德年製	上部開光內為：阿拉伯文，زین الله，意為「阿拉將……裝飾、美化」。下部開光內單字為阿拉伯文，ملکه，意為「國土、國家、政權」，不考慮其它圖片未見部分是否還有單字，[189] 這兩個開光內的文字可以合譯為：「阿拉會美化他的國土」。	阿姆斯特丹荷蘭國立博物館 (18)
20	花插	a 青花阿拉伯文番蓮七孔花插 b 高 19.6 球徑 16.8 足徑 12.1 c 大明正德年製	整器書寫阿拉伯文。 此面 الهمّ امن بلده：「阿拉會把他的國土安全化。」 另面 و احفظ ولده：「也會保護他的子孫。」 兩句合譯為：「阿拉會保護他的國土也會保護他的子孫。」	國立故宮博物院（故瓷 8485）

187 原品名為〈青花阿拉伯文四方瓶〉，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海外遺珍 陶瓷》，頁 149。

188 該作品於出處訂為阿拉伯文，見 Jessica Harrison-Hall, *Ming Ceramics in the British Museum*, p. 198.

189 目前所見該作品圖片並未顯示另面文字，但就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收藏圖錄中，已有 K.W. Lim 對此藏品之器身前後各兩開光文字進行翻譯：「願阿拉增美他的國土、保佑他的昌盛，直到永遠」（May Allah grace his kingdom by reserving its prosperity for as long as it lasts.）請見 Jörg and van Campen,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Rijksmuseum*, p. 36. p. 11 說明。

21	花插	a 青花阿拉伯文番蓮七孔花插 b 高 19.5 徑 15.7 c 大明正德年製	整器書寫阿拉伯文。 此面 الهمّ امن بلده：「阿拉會把他的國土安全化。」 另面 و احفظ ولده：「也會保護他的子孫。」 兩句合譯為：「阿拉會保護他的國土也會保護他的子孫。」	大英博物館 (16)
22	花插	a 青花阿拉伯文番蓮七孔花插 b 高 19.5 徑 15.7 c 大明正德年製	整器書寫阿拉伯文。此面 الهمّ امن بلده：「阿拉會把他的國土安全化。」另面 و احفظ ولده：「也會保護他的子孫。」兩句合譯為：「阿拉會保護他的國土也會保護他的子孫。」	大英博物館 (16)
23	蓋硯	a 青花阿拉伯文蓋硯 b 底座 25.8x15.5 高 11.5 蓋 24.0x13.5 c 大明正德年製	器蓋：阿拉伯文 عليكم بحسن الخط فانه من مفا تيح الرزق 直譯：「把書法的技術練好，因為可以找到吃飯的鑰匙的一種（賺錢的方法）」。意譯：「精詣於書道乃為生存之鑰。」 較寬側的兩面：波斯文：علم درريست نيک 「智慧像珍珠一樣。」 جهل دردیست سخت「無知（知識的相反）是嚴重的痛（痛苦的毛病）。」 較窄側的一面：圖示僅得一字，波斯文：با قيمت「寶貴」。	吉美博物館（筆者自攝，請見圖 3)
24	蓋硯	a 青花阿拉伯文蓋硯 b 高 7 長 24.8 寬 14 c 大明正德年製	器蓋：阿拉伯文 عليكم بحسن الخط فانه من مفا تيح الرزق 直譯：「把書法的技術練好，因為可以找到吃飯的鑰匙的一種（賺錢的方法）」。 意譯：「精詣於書道乃為生存之鑰。」	大英博物館 (16)
25	蓋硯	a 青花阿拉伯文蓋硯 b 高 9 長 20 寬 11 c 大明正德年製	器蓋靠近左側的兩個圓形開光阿拉伯文文字，合譯為：الاحمق لا يجد لذّه「笨蛋找不到娛樂。」 側面與器蓋右側兩個圓形開光文字相同：كما لاينفع بالورد 「就像花沒有用。」 側面相對的兩邊內為阿拉伯文：一面為：阿拉伯文 الحكمه，「智慧」 另面為：صاجر الركمه，兩字意義不明。也許是書寫錯誤或目前不再使用的單字。	大英博物館 (16)
26	共蓋硯	a 青花唐草紋共蓋硯 b 資料不明 c 大明正德年製	器蓋：阿拉伯文 عليكم بحسن الخط فانه من مفا تيح الرزق 直譯：「把書法的技術練好，因為這是可以找到吃飯的鑰匙的一種（賺錢的方法）」。意譯：「致力於書法的卓越乃為生存之鑰。」 側面：阿拉伯文 كما لاينفع بالورد「就像花無法用。」	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館 (23)

27	蓋盒	a 青花回文長方形盒 b 長 20.5 寬 10.5 高 9.1 c 大明正德年製	器蓋：阿拉伯文 عليكم بحسن الخط فانه من مفا تيح الرزق 直譯：「把書法的技術練好，因為可以找到吃飯的鑰匙的一種（賺錢的方法）」。意譯：「精詣於書道乃為生存之鑰。」 較寬側的兩面：波斯文：علم درريست نيک「智慧像珍珠一樣。」 جهل درديست سخت「無知（知識的相反）是嚴重的痛（痛苦的毛病）。」	香港天民樓 (11)
28	蓋盒	a 青花蓋盒殘件 b 長 24.5 寬 13.8 高 10 c 大明正德年製	圖片模糊故無法辨識。	2002-2004 景德鎮明清御窯遺址發掘 (1)
29	盒子	a 青花回字文方形盒 b 徑 .19.5，總高 9.0 c 大明正德年製	器蓋：阿拉伯文 اكمِل الطعام，有兩種可能的解讀（最高級）「最完美的食物。」（命令式）「把食物吃完！」 側面：阿拉伯文 تحاب و 你們要相親相愛。」（命令式）	瑞典遠東博物館 (14)
30	圓盒	a 青花阿拉伯文圓盒 b 高 7.8 口徑 16.5 c 大明正德年製	器蓋：阿拉伯文 والشفقة على خلق الله「憐憫阿拉的創造」＝「憐憫人家」。器蓋側面：波斯文 اى سامع قالات من بنگر كنون حالات من 「噢！那些聽我話的人，現在輪到要來看（而學習）我的表現。」 器身側面：波斯文 اى جداى ، بنماى بيندگان روى راحت، 「噢，神啊！向你的僕人顯現寧靜、輕鬆、無憂的一面，」 تو خداى كه جز نيست「別無他神唯有你是神。」	北京故宮博物院 (4)
31	圓盒	a 青花阿拉伯文圓盒 b 高 7 口徑 16.5 c 大明正德年製	器蓋：阿拉伯文 والشفقة على خلق الله「憐憫阿拉的創造」 器蓋側面：波斯文 اى سامع قالات من بنگر كنون حالات من 「喂！那些聽我話的人，現在輪到要來看（而學習）我的表現。」 器身側面：波斯文 اى خداى بنماى بيندگان روى راحت 「喔，神啊！向你的僕人顯現寧靜、輕鬆、無憂的一面，」 تو خداى كه جز نيست「別無他神唯有你是神。」	大英博物館 (16)
32	燭臺	a 青花回字唐草紋六角燭臺 b 資料不明 c 資料不明	從圖示正面兩個開光僅能得知其雖使用阿拉伯語詞，文法是波斯文的。ايمان：信仰，中譯「伊瑪尼」、「真賜」。[190] از：介系詞，從。خطر：危險。合譯為：از خطر	Mr.R. H. Palmer (23)

190 在伊斯蘭教裡，將宗教基本原則分為「伊瑪尼」、「伊巴達特」（宗教義務）、「伊哈尚」（善行），伊瑪尼即「ايمان」的阿拉伯語音譯。明末清初王岱與把「伊瑪尼」譯為「真賜」，認為伊瑪尼是真主賜予人們內心的信仰基因。見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蘭研究室編、秦惠彬主編，《中國伊斯蘭教基礎知識》，頁 117。

			ايمان「信仰…（判斷可能是「保護」）使你避開危險。」	
33	燭臺	a 青花波斯文六角燭臺 b 資料不明 c 資料不明	خراب ميگشتم تا بگنج فروشدم ناگاه كرد كدج 「我為了追求他（阿拉），已經進入像喝醉的修行，還要（希望）突然（有恩惠能）付上寶藏才可得到。」（？）	美國費城藝術博物館 (23)
34	燭臺	a 青花波斯文六角燭臺 b 高 15.0 最大幅 12.0 口徑 6.5 c 大明正德年製	خراب ميگشتم تا بگنج فروشدم ناگاه كرد كدج 「我為了追求他（阿拉），已經進入像喝醉的修行，還要（希望）突然（有恩惠能）付上寶藏才可得到。」（？）	吉美博物館（筆者自攝，請見圖 49）
35	燭臺	a 青花波斯文燭臺[191] b 高 24.6 口徑 6.7 足徑 13 c 大明正德年製	燭臺上端頸部：波斯文 تاريكخانه「暗房、暗的地方。」 器身下半部兩個單字：نماى است الدانيه「會表示出來的」	北京故宮博物院 (4)
36	尊	a 青花阿拉伯文番蓮尊 b 高 25 深 23.7 口徑 11.3 足徑 11.2 c 大明正德年製	四面連讀為： الهم احفظ ولاته「（阿拉）保佑他的朋友們。」 و ذماعدايه「責備他的敵人們。」	國立故宮博物院（故瓷 9183）
37	碗	a 青花阿拉伯文罐 b 高 36 口徑 17.3 足徑 18 c 資料不明	罐頸部為阿拉伯文，六個開光內依次書寫： قال النبي「先知＋說」、عليه السلام「祝禱詞」（當文字提到先知穆罕默德時，會在後面加上此祝禱詞）、لسانه「他的舌」、عذج「？」（非完整阿拉伯文字，僅可看出 عذج，該字為一人名，意思是「完美」，現在已經無人使用該名）、أخوانه「他的兄弟」、كثر「多」。 合寫為 قال النبى عليه السلام لسانه عذج كثر اخوانه 但勉強只能譯為「先知（我們讚美他）他說：『……他的兄弟。』」 罐身開光內文字一面為阿拉伯文， المؤمن حلو ىّ「信徒該作一個好榜樣。」 另面亦為阿拉伯文，حب الحلاوة「他喜歡甜食」	首都博物館 (5)
38	罐	a 青花阿拉伯文梅花圓罐[192] b 高 11.3 深 10.4 口徑 6.3 足徑 6.9 c 大明正德年製	四面開光內各置一阿拉伯文單字，分別為：「صاحب（陪伴）」、「الخيار（好人們）」、「تامن（小心，找安全、保護）」、「الاشرار（壞人們）」，合譯為：「親賢人、遠小人」。	國立故宮博物院（故瓷 10691）

191 原品名為〈青花阿拉伯文燭臺〉，見耿寶昌主編，《青花釉裡紅》（中），頁 61，圖 56。
192 同註 29。

39	壺	a 青花開光阿拉伯文瓶 b 高 13 口徑 5.5 底徑 8.8 c 大明正德年製	筆者僅得一面文字，應為波斯文，可拆解為「فضل（優點、優勢）」與「اوتاده（柱子們）」或是「فضل（優點、優勢）」與「او（第三人稱的『他』）」與「تازه（新鮮的）」。	常熟博物館 (7)
40	碗	a 青花阿拉伯文碗 b 高 9.5 口徑 13.9 足徑 7 c 大明正德年製	阿拉伯文單詞合譯為： قال على رحم الله خذ ما صفا و دع ماقذر 「願阿拉憐憫的阿里說：『抓住那個光明的，遠離那個污穢的。』」	北京故宮博物院 (4)
41	碗	a 青花阿拉伯文碗 b 高 8.5 口徑 19.7 足徑 7.5 c 大明正德年製	碗心：بركت，波斯文，「恩惠」。側面六開光內文字為阿拉伯文，分別是 قال على「阿里說」、شربنا「我們喝了」、و احرقنا「把東西燃燒」、على「在上面」、الارض「土地或者地上」、جرعه「一口水」（「喝」的單位，一口喝的量）。組合起來為「قال على شربنا و احرقنا علىالارض جرعه」意義如何，無法譯出。	北京故宮博物院 (4)
42	碗	a 青花阿拉伯文碗 b 高 12.3 口徑 28.1 足徑 11 c 大明正德年製	碗心：阿拉伯文，الشكربنعمته「我感謝因為他（阿拉）的恩惠」 側面：六個開光內阿拉伯文可分為兩單詞一組，計三個詞組，افشو السلام「散佈和平。」و اطعمو الطعام「給人家吃飯（分享食物或者提供食物給人家吃）」و صلو الارحام「去拜訪你們的親戚們」	北京故宮博物院 (4)
43	碗	a 青花阿拉伯文碗 b 口徑 28.0 高 12.3 c 正德年製	碗心：阿拉伯文 الشكربنعمته「感謝阿拉的恩典。」 側面：從圖片所示僅知兩開光內文字為阿拉伯文。右開光：波斯文 جاويد باد，「萬歲」；左開光：波斯文 خداوندى，「神性的」；「神的」。	華盛頓佛利爾美術館 (19)
44	碗	a 青花文字紋碗 b 口徑 12.5 高 6.5 c 正德年製	碗心中央：波斯文 نعمت，「恩典」、「恩惠」之意。 碗心四條文字文意皆同，為阿拉伯文：لا اله الا الله محمد رسول الله「萬物非主，唯有阿拉，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使者。」 碗側面：阿拉伯文，重複寫著一樣的句子，即：الهمّ صلى على محمد و آل محمد「啊，神啊！啊！阿拉，讚揚穆罕默德和他的眷屬（家庭）。」	砲門宮博物館 (22)
45	碗	a 青花龍唐草文字紋碗 b 口徑 24.0 高 13.5 c 大明正德年製	此件作品之譯文因所佔篇幅較多，請參見正文頁 161、162。	砲門宮博物館 (22)

46	盤	a 青花阿拉伯文盤 b 徑 26.0 c 大明宣德年造	此件作品之譯文因所佔篇幅較多，請參見正文頁 161、162。	砲門宮博物館 (22)
47	盤	a 青花波斯文蓮花盤 b 高 3.7 深 2.5 口徑 15.7 足徑 8.9 c 大明正德年製	盤心中央：波斯文 نعمت「恩典」、「恩惠」之意。 盤側面：波斯文 در بزهٔ حلق خود را پاک دار از هر مزهٔ تا نیفتی در وبال 直譯：「在犯罪的部分，從每一種不同的味道把你的喉嚨保留乾淨，才不會碰到麻煩。」意譯：「不要靠近任何犯罪，才不會遇到問題。」	國立故宮博物院（故瓷 15704）
48	盤	a 青花波斯文蓮花盤 b 高 3.8 深 2.6 口徑 15.6 足徑 9.0 c 大明正德年製	盤心中央：波斯文 نعمت「恩典」、「恩惠」之意。 盤側面：波斯文 در بزهٔ حلق خود را پاک دار از هر مزهٔ تا نیفتی در وبال 直譯：「在犯罪的部分，從每一種不同的味道把你的喉嚨保留乾淨，才不會碰到麻煩。」意譯：「不要靠近任何犯罪，才不會遇到問題。」	國立故宮博物院（故瓷 15705）
49	盤	a 青花波斯文蓮花盤 b 高 3.8 深 2.6 口徑 15.6 足徑 9.0 c 大明正德年製	盤心中央：波斯文 نعمت「恩典」、「恩惠」之意。 盤側面：波斯文 در بزهٔ حلق خود را پاک دار از هر مزهٔ تا نیفتی در وبال 直譯：「在犯罪的部分，從每一種不同的味道把你的喉嚨保留乾淨，才不會碰到麻煩。」意譯：「不要靠近任何犯罪，才不會遇到問題。」	（故瓷 15706）
50	盤	a 青花波斯文蓮花盤 b 高 3.8 深 2.6 口徑 15.6 足徑 9.0 c 大明正德年製	盤心中央：波斯文 نعمت「恩典」、「恩惠」之意。 盤側面：波斯文 در بزهٔ حلق خود را پاک دار از هر مزهٔ تا نیفتی در وبال 直譯：「在犯罪的部分，從每一種不同的味道把你的喉嚨保留乾淨，才不會碰到麻煩。」意譯：「不要靠近任何犯罪，才不會遇到問題。」	國立故宮博物院（故瓷 15707）
51	盤	a 青花波斯文蓮花盤[193] b 高 3.7 口徑 15.6 足徑 9 c 大明正德年製	盤心中央：波斯文 نعمت「恩典」、「恩惠」之意。 盤側面：波斯文 در بزهٔ حلق خود را پاک دار از هر مزهٔ تا نیفتی در وبال 直譯：「在犯罪的部分，從每一種不同的味道把你的喉嚨保留乾淨，才不會碰到麻煩。」意譯：「不要靠近任何犯罪，才不會遇到問題。」	北京故宮博物院 (4)

193 原品名為〈青花纏枝蓮阿拉伯文盤〉，見耿寶昌主編，《青花釉裡紅》(中)，頁 71。

52	盤	a 青花阿拉伯文盤 b 高 15.5 徑 28.8 足徑 18.0 c 大明正德年製	盤心：阿拉伯文 قال نبى：「先知說」 側面：六個開光內阿拉伯文合寫成 رحم الله عبدا قال فغنم او صمت فسلم 「阿拉饒恕他的僕人（誰）開口便帶來好處，沈默則避免麻煩。」	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 (17)
53	盤	a 青花阿拉伯文盤 b 徑 15.1 c 大明正德年製	盤心：阿拉伯文 قال على：「阿里說」 側面：六個開光內阿拉伯文合寫成 اظهارالغنى من الشكر رحمه الله 「若你顯現你的充裕，即表達了感謝阿拉的恩惠。」	英國大衛德基金會舊藏，現由大英博物館保管 (20)
54	盤	a 青花阿拉伯文大盤 b 徑 58.5 高 11.5 c 大明正德年製	盤心：阿拉伯文 الشكر على نعمائه「感謝他（阿拉）所有的恩典。」	德黑蘭考古博物館 (9)
55	盤	a 青花阿拉伯文盤 b 徑 41.5 c 資料不明	盤心：波斯文 طهارت「清潔」之意（此為動名詞，做禮拜前的「小淨」也可以用這個字） 盤側面：文字顯示不全，無法辨認。	中國歷史博物館 (13)
56	方盆	a 青花方盆殘片 b 高 10.3 c 資料不明	右上角為阿拉伯文：افضل，意為「最好的」、「最棒的」。 左上角殘缺處猜測可能為阿拉伯文，الطعام，意為「食物」。 兩字合譯為「最好的食物」。	
57	方盆	a 青花方盆殘片 b 殘高 3.6 c 資料不明	الشكر على الطاف كرمه，阿拉伯文，意為「感謝他慷慨的恩慈」。	2002-2004 景德鎮明清御窯遺址發掘 (1)
58	大盤	a 青花折沿大盤殘片 b 殘寬 49 c 大明正德年製	文字顯示不明，無法譯出。	2002-2004 景德鎮明清御窯遺址發掘 (1)
59	瓷片	a 青花回文瓷板瓷片 b 殘長 12.1 厚 1.7 c 資料不明	因此瓷片有殘缺處，但仍可猜測殘缺部分之文字，殘缺文字部分筆者以粗黑體字標示：الرازق عن المرزو**قين**「供應被供應的人。」 القادر عن المقدورين「對我們有所不能的人來說，你是無所不能的。」**حسبى** الله لا اله الا هو عليه **توكلت** 「對我來說，我只需要那位阿拉就夠了，別無他神唯有阿拉的阿拉，我依賴他。」 و هو رب العرش العظيم「他是（天上）偉大寶座的主人。」	1987 年珠山出土 (8)
60	欄板	a 青花欄板殘片 b 長 37.4 寬 33.4 厚 1.5 c 資料不明	此欄版上殘存處為 لا اله الا الله محمد，筆者猜測這應「清真言」的一部分，後半部殘破處應是 رسول الله，結合成 لا اله الا الله محمدرسول الله，合譯為：「萬物非主，唯有阿拉，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使者。」	2002-2004 景德鎮明清御窯遺址發掘 (1)

61	盤	a 明正德描紅回文盤 b 高 4.0，口徑 19.5 c عمارت کرده دی مینک شاه است سلیمان 「大明（小經文字）蘇賚曼國王所製造」（波斯文）	盤心中雙圈內文字：阿拉伯文 (و اذ تاذن ربكم) لئن شكرتم لازيدنكم و لئن كفرتم ان عذابى لشديد[194] 古蘭經第十四章第七句：當時，你們的主曾宣布說：『如果你們感謝，我勢必對你們恩上加恩；如果你們忘恩負義，那麼，我的刑罰確是嚴厲的。』 在盤心四邊的文字： 阿拉伯文（順序：上、下、右、左）： قال الله سبحانه تبارک و تعالى「至高無上的阿拉所說」 以盤底正向觀看阿拉伯文，上、左、下、右，合讀為： كما قال الله سبحانه تبارک و تعالى يايها الناس انكرو نعمه الله عليكم هل من خالق غير الل صدق الله العظيم 「如同至高的阿拉所說的，『人們啊！你們應當銘記真主所賜你們的恩惠，除真主外，還有什麼創造者能從天上地下供你們嗎？』（古蘭經第三十五章第三節）[195] 偉大的阿拉所說的是真理。」	國立故宮博物院（故瓷 7231）
62	盤	a 明正德描紅回文盤 b 高 3.5 口徑 17.7 c ، يعنى شاه دى مينک جنک دى سليمان عمارت كرد نيک جى 「『大明正德年製』，也就是蘇賚曼國王所製造。」	盤心中雙圈內文字：阿拉伯文 ولا تبسطها كل البسط فتقعد ملوما محسورا 《古蘭經》第十七章二十九節的後半句：「也不要把手完全伸開，以免你變成悔恨的受責備者。」[196] 在盤心四邊的文字：阿拉伯文（順序：上、下、右、左） قال الله سبحانه تبارک و تعالى「如同至高的阿拉所說」 側面：阿拉伯文，由此圖由正上方起順時鐘依序為： كما قال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 تعالى「如同至高的阿拉所說的。」 هل جزاء الاحسان الا الاحسان (الرحمن 60) 「行善者，只受善報」。《古蘭經》第五十五章六十節 فمن يعمل مثقال ذرة خيرا يره ، و من يعمل مثقال ذرة شرا يره (الزلزله 7 و8) 「行一個小螞蟻重的善事者，將見其善報；作一個小螞蟻重的惡事者，將見其惡報。」《古蘭經》第九十九章七、八節	國立故宮博物院（故瓷 6768）

194 括弧內標示黑體的字詞是《古蘭經》原文中有書寫、但此盤並未寫出的文字。
195《中文譯解古蘭經》，頁 434。
196《中文譯解古蘭經》，頁 285。

63	盤	a 明正德描紅回文盤 b 高 4.5，深 3.5，口徑 20.1，足徑 12.2 c دی مینک جنک دی نیک جی 小經文字「大明正德年製」	盤心中雙圈內文字：波斯文 الابتدا همایون، الانتهامیمون「一開始很光輝，結束也很祝福（帶來好運）。 在盤心四邊的文字：（順序右、下、左、上） 波斯文 الابتدا همایون ، الانتها میمون「一開始很光輝，結束也很祝福（帶來好運）。」 ای کریمی که از خزانه غیب ، گبر وترسا وظیف خور داری دوستان را کجا کنی محروم ، تو که با دشمنان چنین نظر داری 直譯：「啊！你這個慷慨的人，從眼目不能見的神聖寶庫，就連那些不信你的祆教和基督徒，你都餵養他們。既然你對你的敵人們好，怎麼可能會讓你的朋友受剝奪呢？」	國立故宮博物院（故瓷 2840）
64	盤	a 明正德描紅回文盤 b 高 4.4，口徑 21.1 c دی مینک جنک دی نیک جی 小經文字「大明正德年製」	阿拉伯文：والله الغنی وانتم الفقرا「真主確是無求的，你們確是有求的。」（《古蘭經》第四十七章三十八節） 在盤心四邊的文字：阿拉伯文（順序：上、右、左、下） قال الله سبحانه تبارک و تعالی「如同至高的阿拉所說。」（此文並非出自《古蘭經》） 側面：阿拉伯文 順序（從盤背面最頂端開始逆時鐘方向書寫） الحمد لله حمد الشاکرین ، حمد ذاکرین حمدا کثیرا ، 「滿懷謝意地感謝阿拉，以唱詩讚美來感謝阿拉，以很多的感謝來感謝阿拉。」 یوافی نعمه و یکافئ مزیده ، 「他（阿拉）會把他的恩惠給人，而且不停繼續地增加（恩惠）。」 رب اغفر و ارحم و انت خیر الراحمین و تم بالخیر 「（祈求阿拉）喔！（真）主啊！原諒我，憐憫我，那就是你，你是最會憐憫人的人，以一個好的方式結束。（我的禱告結束了）」	國立故宮博物院（故瓷 13384）
65	盤	a 明正德描紅回文盤 b 高 4.3，口徑 21.0 c دی مینک جنک دی نیک جی 小經文字「大明正德年製」	阿拉伯文：والله الغنی وانتم الفقرا 「阿拉確是無求的，你們確是有求的。」（《古蘭經》第二十六章三十八節）在盤心四邊的文字：阿拉伯文（順序：上、右、左、下） قال الله سبحانه تبارک و تعالی「如同至高的阿拉所說。」（此文並非出自《古蘭經》） 阿拉伯文： 順序（從盤背面最頂端開始逆時鐘方向書寫） الحمد لله حمد الشاکرین ، حمد الذاکرین حمدا کثیرا ، 「滿懷謝意地感謝阿拉，以唱詩讚美來感謝阿拉，以很多的感謝來感謝阿拉。」 یوافی نعمه و یکافئ مزیده ،	國立故宮博物院（故瓷 13385）

			「他（阿拉）會把他的恩惠給人，而且不停繼續地增加（恩惠）。」 رب اغفر و ارحم و انت خير الراحمين و تم بالخير 「（祈求阿拉）喔！（真）主啊！原諒我，憐憫我，那就是你，你是最會憐憫人的人，以一個好的方式結束。（我的禱告結束了）」	
66	盤	a 明正德描紅回文盤 b 尺寸不明 c دى مينک خان يعنى شاه سليمان عما رت كرد 「大明汗，也就是蘇賚曼國王製造的（蓋的）。」	盤心中雙圈內文字： (الاسرا 29) ولا تبسطها كل البسط فتقعد ملوما محسورا 《古蘭經》第十七章二十九節的後半句：「也不要把手完全伸開，以免你變成悔恨的受責備者。」[197] 在盤心四邊的文字：（順序：上、下、右、左） قال الله سبحانه تبارک و تعالى「如同至高的阿拉所說的。」 由此圖由正上方起順時鐘依序為： كما قال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 تعالى「如同至高的阿拉所說的」 هل جزاء الاحسان الا الاحسان (الرحمن 60)「行善者，只受善報」。《古蘭經》第五十五章六十節 فمن يعمل مثقال ذرة خيرا يره ، و من يعمل مثقال ذرة شرا يره (الزلزله 7 و8) 「行一個小螞蟻重的善事者，將見其善報；作一個小螞蟻重的惡事者，將見其惡報。」《古蘭經》第九十九章七、八節	北京故宮博物院 (3)
67	盤	a 明正德描紅回文盤 b 高 3.9，口徑 15.9，底徑 10.1 c دى مينک جنک دى نيک جى 小經文字「大明正德年製」	阿拉伯文：ان الله يرزق من يشاء بغير حساب 「真主必定無量地供給他所意欲的人。」（《古蘭經》第三章三十七節）在盤心四邊的文字：阿拉伯文（順序：上、右、下、左） كما قال الله سبحانه تبارک و تعالى「如同至高的阿拉所說的。」 以款識正向為主之左側與右側文字同為： 波斯文：راست گفت خداى تعالى بزرگ 「至高偉大的神，祂的話是正確的。」 以款識正向為主之上端與下端文字同為： 阿拉伯文：صدق الله العظيم「偉大阿拉說的話是真理。」	上海博物館 (10)

197《中文譯解古蘭經》，頁 285。

68	盤	a 明正德描紅回文盤 b 高 4.4，口徑 21.1 c دى مينک جنک دى نيک جى 小經文字「大明正德年製」	盤心中雙圈內文字：阿拉伯文 الحمد لله على كل نعماته「感謝阿拉，為了他的所有恩惠。」 在盤心四邊的文字： 阿拉伯文（順序：上、右、下、左） لايحصى الله بنعمته الشكران「再多的感恩也無法比擬阿拉賜予的恩典。」 阿拉伯文：順序由最頂端的文字依逆時針方向分做五句。 1. قال رسول الله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 「阿拉會讚美他、說他好話的使者（先知）說，」 2. راحت الجسم فى قلت الطعام ، 「少吃飯你的身體就會舒服。」 3. و راحت السان فى قلت الكلام ، 「少講話你的舌頭就會舒服。」 4. و راحت القلب فى قلت الاهمام ، 「少憂煩你的精神就會舒服。」 5. و راحت الروح فى قلت الاثام 「少犯罪你的心靈就會舒服。」	科威特博物館 (21)

本表資料來源：

(1)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江西景德鎮明清御窯遺址發掘簡報〉，《文物》(2007:5)，頁 4-47。

(2) 劉偉，《帝王與宮廷瓷器（上）》，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

(3) 呂成龍主編，《你應該知道的 200 件古代陶瓷》，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8。

(4) 耿寶昌主編，《青花釉裡紅》（中），香港：商務印書館，2000。

(5) 耿寶昌主編，《中國文物精華大全瓷器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

(6)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海外遺珍陶瓷》，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6。

(7) 錢浚、周公太編，《常熟博物館藏瓷》，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99。

(8) 香港藝術館編製，《景德鎮珠山出土永樂宣德官窯瓷器展覽》，香港：香港市政局，1989。

(9) 陳育寧、湯曉芳編著，《中國回族文物》，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8。

(10) 中國陶瓷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陶瓷全集》明，上海：上海人民美術，2000。

(11) 汪慶正、葛師科主編，《天民樓珍藏青花瓷器》，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

(12) デイジー・リオン＝ゴールドシユミツト（Daisy Lion-Goldschmidt）著、瀨藤瓔子、岩永泰造翻譯，吉田光邦監修，《明の陶磁》，京都：駸々堂，1982。

(13) 佐藤サアラ，〈正德アラビア文字裝飾青花に關する一考察〉，《東洋陶磁》32(2003)，頁 65-98。

(14) Bo Gyllensvärd, *Oriental Ceramics, the World's Great Collections vol. 8.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Tokyo, New York and San Francisco: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80-1981.

(15) Jan Fontein, Wu Tung; introd., Jan Fontein, *Oriental Ceramics, the World's Great Collections vol. 10.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Tokyo, New York: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80-1981.

(16) Jessica Harrison-Hall, *Ming Ceramics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2001.

(17) John Carswell, *Blue and White: Chinese Porcelain Around the World*, London: British Museum, 2000.

(18) Jörg and van Campen,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Rijksmuseum*, Amsterdam: Rijksmuseum, 1997.

(19) Josephine H. Knapp, Esin Atil; Introduction, John A.Pope, *Oriental Ceramics, the World's Great*

Collections vol. 9.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 Tokyo, New York and San Francisco: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80-1981.

(20) Margaret Medley, *Oriental Ceramics, the World's Great Collections vol. 6.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London*, Tokyo, New York and San Francisco: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80-1981.

(21) Oliver Watson, *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Kuwait National Museum*, London: Thame &Hudson, 2004.

(22) Regina Krahl, edited by John Ayers,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A Complete Catalogue* Ⅱ *Yuan and Ming Dynasty,* New York: Sotheby's Publications, Harper and Row, 1986.

(23) Sir Harry Garner, *Oriental Blue And Whit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54.

(24) Suzanne G.Valensrein, Julia Meech-Pekarik, Marilyn Jenkins, *Oriental Ceramics, the World's Great Collections vol. 11.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Tokyo, New York and San Francisco: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80-1981.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1964。

（明）王世懋，《窺天外乘》（沈節甫輯《紀錄彙編》本），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微縮複製中心，1994。

（明）王宗沐，《江西大志．陶書》，收入李科友、吳水存，《古瓷鑑定指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

（明）王宗沐纂修；（明）陸萬垓增修，《江西省大志》八卷（《中國方志叢書》據明萬曆二十五年 [1597] 刊本影印），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明）朱琰，《陶說》，北京：中華書局，1991。

（明）何喬遠撰，《名山藏》（《續修四庫全書》427 冊，據明崇禎刻本影印），〈王享記〉，〈東南夷滿剌加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明）李洵校注，《明史食貨志校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2。

（明）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北京：中華出版，新華發行，1982。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

（明）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明）談遷，《國榷》第五冊，臺北：鼎文書局，1978。

（明）嚴從簡撰、余思黎點校，《殊域周咨錄》（《中外交通史籍叢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93。

（清）毛奇齡，《明武宗外紀》，收入張溟等著，《明武宗外紀》，臺北：廣文書局，1964。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收入徐德明、吳平主編，《清代學術筆記叢刊》40，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

（清）馬注、王岱輿，《清真指南．正教真銓》，臺北：珪庭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

二、近代論著

丁明仁，《伊斯蘭文化在中國》，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丁明俊，〈明朝與中亞穆斯林貢貿關係探析〉，《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2004 年 2 期，頁 29-34。

小田壽典原著，郭汾譯，〈十六世紀初有關中國的伊斯蘭史料——對阿里．阿克巴爾著《中國志》的重新評價〉，收入阿里．阿克巴爾著，張至善編，《中國紀行》，北京：三聯書店，1988。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蘭研究室編、秦惠彬主編，《中國伊斯蘭教基礎知識》，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

王引，〈鄭和家世及其墓葬考略〉，《海交史研究》，1985 年 7 期，頁 70-72。

王曉蓮，〈青花三足筒爐〉，《文物天地》，1992 年 1 期，頁 18。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江西景德鎮明清御窯遺址發掘簡報〉，《文物》，2007 年 5 期，頁 4-47。

石守謙，〈明代繪畫中的帝王品味〉，《文史哲學報》，第 40 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93，頁 225-291。

朱江，〈揚州出土的唐代阿拉伯文背水瓷壺〉，《文物》，1983 年 2 期，頁 95。

作者不詳，《中文譯解古蘭經》，出版者不詳，1992。

余佩瑾，〈別有新意——以乾隆官窯的創新爲例〉，《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2，頁 281-295。

吳東閣，〈南陽發現明代伊斯蘭文物〉，《中國穆斯林》，1994 年 4 期，頁 25。

呂成龍，〈關於八思巴字款青花瓷器年代之我見〉，《文物》，2001 年 8 期，頁 77-83。

李洵，〈正德皇帝生母之謎（上）〉，《紫禁城》，2009 年 1 期，頁 55-59。

李洵，〈正德皇帝生母之謎（下）〉，《紫禁城》，2009 年 2 期，頁 42-44。

李毅華，〈兩件正德朝阿拉伯文波斯文瓷器——兼談伊斯蘭文化的影響〉，《故宮博物院院刊》，1984 年 3 期，頁 49-51。

李蔚然，〈南京牛首山弘覺寺塔及其地宮出土文物綜述〉，《東南文化》，2002 年 9 期，頁 70-72。

李興華、秦惠彬、馮金源、沙秋真合著，《中國伊斯蘭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佘城，〈北宋畫院制度與組織的探討〉，《故宮學術季刊》，1 卷 1 期，1983，頁 69-118。

卓鴻澤，〈正德的番、回傾向——大明皇帝對異族宗教的追求〉，收入林富士主編《中國史新論——宗教史分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頁 413-438。

周燮藩、沙秋真，《伊斯蘭教在中國》，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

林松，〈從回回民族特殊心理意識綜觀鄭和宗教信仰的複雜性〉，收入吳海鷹主編《鄭和與回族伊斯蘭文化》，銀川：寧夏出版社，2005，頁 94-106。

林長寬，《中國回教之發展及其運動》，臺北：中華民國阿拉伯文化經濟協會，1996。

林莉娜，〈明代宮廷繪畫機構制度考〉，《故宮學術季刊》，13 卷 1 期，1995 年秋季號，頁 70-95。

炎黃藝術館編，《景德鎮出土元明官窯瓷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邱仲麟，〈皇帝的餐桌：明代的宮膳制度及其相關問題〉，《臺大歷史學報》第 34 期，2004，頁 1-42。

邱樹森，〈明武宗與明代回回人〉，《回族研究》，2004 年 1 期，頁 42-47。

邱樹森主編，《中國回族史》（上）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6。

阿里．阿克巴爾著，張至善編，《中國紀行》，北京：三聯書店，1988。

阿里．瑪扎海里著、耿昇譯，《絲綢之路：中國—波斯文化交流史》，北京：中華書局，1993。

胡云生，〈南陽的清真寺〉，《中國穆斯林》，1993 年 3 期，頁 31-33。

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景德鎮珠山出土陶瓷》，香港：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1992。

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及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景德鎮出土五代至清初瓷展》，香港：馮平山博物館，1992。

孫錦泉，〈華瓷運銷歐洲的途徑、方式及其特徵〉，《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 年 2 期，頁 90-95。

桑原騭藏著、馮攸譯，《中國阿剌伯海上交通史》，臺北：商務出版社，1980。

索予明，《中國漆工藝研究論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7。

耿寶昌，《明清瓷器鑑定》，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3。

耿寶昌主編，《青花釉裡紅》（中），香港：商務印書館，2000。

草千里編，《中國歷代陶瓷款識》上冊，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4。

袁義芬，〈阿拉伯文與波斯文形貌之比較〉，《阿拉伯世界》，1997 年 3 期，頁 72-74。

馬文寬，〈伊朗塞爾柱克伊斯蘭陶器及與中國瓷器的關係〉，《故宮學刊》，2005 年 2 期，頁 140-179。

馬金寶，〈從三種典型區域發展類型看回族文化〉，收入西安市伊斯蘭文化研究會編《伊斯蘭文化研究》，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8。

馬建春，〈明代陶瓷與伊斯蘭文化〉，《西北民族研究》，1994 年 1 期，頁 89-105、55。

馬景，〈伊斯蘭教三大教派〉，《百科知識》，2007 年 7 期，頁 50-52。

高占福，〈伊斯蘭經堂教育與回族社會的關係〉，收入西安市伊斯蘭文化研究會編《伊斯蘭文化研究》，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頁 102-111。

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編輯，《故宮瓷器錄》第二輯 明乙 上編，臺中：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1961。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纂，《故宮藏瓷 明青花瓷四》，香港：開發股份有限公司，1963。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纂，《故宮藏瓷 明彩瓷二》，香港：開發股份有限公司，1966。

張東，〈論明代景德鎮官窯中的梵文和藏文瓷器〉，《上海博物館集刊》，第七期，1996，頁 144-157。

張鴻年，〈波斯大詩人薩迪和《果園》《薔薇園》（譯者序）〉，收入薩迪著、張鴻年譯，《果園》，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張麗端，〈從《活計檔》看清高宗直接控管御製器用的兩個機制〉，《故宮學術季刊》，24 卷 1

期，2004，頁 45-70。

許之衡，《飲流齋說瓷》，收入伍躍、趙令雯點校整理，《古瓷鑑定指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頁 194。

陳玉秀，〈以紋識意——從阿拉伯文紋飾談正德時期伊斯蘭教的意涵〉，《故宮文物月刊》，284 期，2006 年 11 月，頁 78-91。

陳育寧、湯曉芳編著，《中國回族文物》，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8，

陳葆真，〈宋徽宗繪畫的美學特質——兼論其淵源和影響〉，《文史哲學報》，第 40 期，1993，頁 293-344。

陳擎光，〈從宗教性紋飾探討十七至十八世紀中國貿易瓷供需之問題〉，《中國古代貿易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4，頁 273-296。

凱倫．阿姆斯壯著，林宗憲譯，《伊斯蘭》，臺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3。

彭濤，〈明代宦官政治與景德鎮的陶政〉，《南方文物》，2006 年 2 期，頁 111、114-120。

童依華，〈明成化瓷器〉，《明成化瓷器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

馮明珠、索文清主編，《聖地西藏——最接近天空的寶藏》，臺北：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2010。

馮增烈，〈漢形制伊斯蘭文物述略〉，《世界宗教研究》，1982 年 1 期，頁 118-124。

黃強，〈從王東洲墓志銘看《金瓶梅》反映的正德朝史實〉，《保定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06 年 3 期，頁 8-12。

黃強，〈論《金瓶梅》對明武宗的影射〉，《江蘇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 年 3 期，頁 49-53。

楊啓樵，《明清皇室與方術》，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楊懷中、余振貴主編，《伊斯蘭教與中國文化》，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5。

葛壯，《伊斯蘭教與中國社會》，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

葛師科，〈也談巴思八文款青花瓷器的年代〉，《文物》，1997 年 6 期，頁 38、43-47。

葛曉康，〈南京牛首山弘覺寺塔地宮初探〉，《東南文化》，1996 年 2 期，頁 110-116。

蓋杰民，〈明武宗與豹房〉，《故宮博物院院刊》，1988 年 3 期（總 41 期），頁 12-19。

趙宏，〈明正德青花瓷器及有關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1992 年 2 期，頁 26-30、60。

劉良佑，〈明代中期官窯與成化窯器之鑑定〉，《故宮文物月刊》，54 期，1987 年 9 月，頁 94-105。

劉迎勝，〈回族與其他一些西北穆斯林文字形成史初探——從回回字到「小經」文字〉，《回族研究》，2002 年 1 期，頁 5-13。

劉迎勝，《《回回館雜學》與《回回館譯語》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劉偉，〈正德時期受伊斯蘭文化影響的宮廷瓷器〉，《故宮博物院院刊》，2010 年 2 期（總 148

期)，頁 86-101。

劉偉，《帝王與宮廷瓷器（上)》，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

劉新園，〈景德鎮出土明成化官窯遺跡與遺物之研究〉，收入《成窯遺珍》，香港：徐氏藝術館，1993，頁 37-40。

劉新園，〈景德鎮珠山出土的明初與永樂官窯瓷器之研究〉，《景德鎮出土明初官窯瓷器》，臺北：鴻禧美術館，1996，頁 9-49。

劉新園，〈明宣宗與宣德官窯〉，《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臺北：鴻禧美術館，1998，頁 129-183。

蔡和璧，《成化瓷器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3。

駱愛麗，〈中亞穆斯林後裔在中國活動初探——以正德朝兩件礬紅回回文瓷器爲基礎〉，《第六屆臺灣與中亞論壇國際學術會議》（2006 年 11 月 23 日會議論文），頁 1-19。

駱愛麗，《十五－十六世紀的回回文與中國伊斯蘭教文化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8。

謝明良，〈十五世紀的中國陶瓷及其有關問題〉，《故宮學術季刊》，17 卷 2 期，1999，頁 123-146。

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景德鎮出土明初官窯瓷器》，臺北：鴻禧美術館，1996。

薩迪著、張鴻年譯，《果園》，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0。

薩迪著、張鴻年譯，《薔薇園》，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0。

薩迪著、楊萬寶譯，《真境花園全譯》，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0。

魏華仙，〈論明代會同館與對外朝貢貿易〉，《四川師範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 年 5 期，頁 16-21。

三上次男，《陶磁の道－東西文明の接点をたずねて－》，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社，2000。

三杉隆敏，〈中國明後期・清朝の染付〉，收入三杉隆敏《世界の染付》3 明後期・清，京都：同朋舍出版，1982，頁 173-225。

杉村棟編輯，《世界美術大全集 東洋編 第 17 卷 イスラーム》，東京：小學館，1999。

佐藤サアラ，〈正德アラビア文字裝飾青花に關する一考察－その生產背景と景德鎮窯業における位置－〉，《東洋陶磁》，32，2003，頁 65-98。

佐藤サアラ，〈明代官窯における成化鬪彩の位置－「天」字銘罐上に見られる龍文樣からの考察－〉，《東洋陶磁》，35，2005，頁 47-63。

谷口閱次，〈成化・弘治・正德窯〉，收入後藤茂樹編輯《世界陶磁全集》第十一卷〈中國元明篇〉，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61，頁 210-220.

尾崎洵盛，〈元・明陶磁の概觀〉，《世界陶磁全集》第十一卷〈中國元明篇〉，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61，頁 169-180。

長谷部樂爾，〈成化、弘治、正德の官窯磁器〉，收入相賀徹夫編輯《世界陶磁全集》第十四卷，東京：小學館，1989，頁 187-194。

相賀徹夫編輯，《世界陶磁全集》第十四卷　明，東京：小學館，1989。

張德信，〈淺析明代的倭寇與海防建設—兼論明代中日關係的走向—〉，收入京都女子大學東洋史研究室編《東アジア海洋域圈の史的研究》京都女子大學研究叢刊 39，京都：京都女子大學東洋史研究室，2003，頁 232-245。

福井泰民，〈アラベスク模様の世界〉，收入涉谷區立松濤美術館企画、編集《アラベスク模様の世界——中近東・イスラムの祈りと幻想：特別展》，東京：涉谷區立松濤美術館企画，2000，頁 9-18。

藤岡了一，《陶磁大系 第四二卷 明の染付》，東京：平凡社，1975。

Brinker, Helmut and Albert Lutz, translated from German by Susanna Swoboda. *Chinese Cloisonné: The Pierre Uldry Collection*, London: The Asia Society Galleries, New York:In association with Bamboo Publishing Ltd, 1989.

Carswell, John. *Blue and White: Chinese Porcelain Around the World*,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0.

Cheng, Te-K'un. "Studies in Chinese Ceramic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Centre for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Art Studies Series(5)*,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82-97.

Fontein, Jan. *Oriental Ceramics v.11.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80-1981.

Garner, Sir Harry. *Oriental Blue And White*, Washiton: Faber and Faber, 1954.

Garner, Sir Harry. "Some Notes on the Chinese Blue and White Exhibition,"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s Society*, vol.28, 1953-54, pp. 51-57.

Gray, Basil. "The Influence of Near Eastern Metalwork on Chinese Ceramics,"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s Society,* vol.18, 1940-1, pp.47-60.

Hobson, R. L. "Chinese Porcelain Fragments from Aidhab, and Some Bashpa Inscriptions,"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s Society 1926-27*, pp. 21-28.

Krahl, Regina, edited by John Ayers.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A Complete Catalogue* Ⅱ *Yuan and Ming Dynasty*, New York: Sotheby's Publications, Harper and Row, 1986.

Laufer, Berthold. "Chinese Muhammedan Bronze," *Ars Islamica*, vol.1, 1934, pp.132-147.

Lipman, Jonathan Neaman. *Familiar Strangers: A History of Muslims in Northwest China*, Seattle,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Pope, Alexander John. *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 Washington: Freer Gallery of Art,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56.

Ridho, Abu. *Oriental Ceramics, v.3. Museum Pusat, Jakarta,* Tokyo, New York and San Francisco: Kodansha International (Ltd.,) 1982.

Wan, C. K. Maggie. "Motif with An Intention: Reading the Eight Trigrams on Official Porcelain of the Jiajing Period (1522-1566)," *Artibus Asiae* Vol. LXIII, No. 2, 2003, pp.191-221.

Watson, Oliver. *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Kuwait National Museum*, London: Thame & Hudson, 2004.

The Follower of Allah: Ming Wu-tsung and the Ceramics with Huihui Characters of the Cheng-te Official Kiln

Weng Yu-wen
Department of the Southern Branch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Huihui characters in the Cheng-te official kiln, and the Ming Wu-tsung's role to the style of his imperial porcelains.

After reviewing the shapes, decorative patterns and Xiaojing scripts of the Cheng-te official wares, it is discovered that the emergence of the Huihui porcelain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is the result of the influence of North-west Islamic culture.

The Cheng-te official kiln wares with Huihui characters are the evidence of the official Islamic religious heritage in the middle of Ming dynasty and also an example of how the style of the official wares was influenced by Ming Wu-tsung at the time.

Keywords: Ming Dynasty Official Kilns, Cheng-te Official Kiln, Ming Wu-tsung, Islam, Ceramics, Huihui Characters.

圖版出處

圖 1 耿寶昌主編，《青花釉裡紅》(中)，香港：商務印書館，2000，頁 61，圖 56。

圖 2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編號故瓷 9183。

圖 3 2011 年 9 月筆者自攝。

圖 4 耿寶昌主編，《青花釉裡紅》（中），香港：商務印書館，2000，頁 83，圖 77。

圖 5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編號故瓷 15705。

圖 6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編號故瓷 7231。

圖 7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編號故瓷 6768。

圖 8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編號故瓷 2840。

圖 9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編號故瓷 13384。

圖 10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編號故瓷 13385。

圖 11 劉偉，《帝王與宮廷瓷器（上)》，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頁 209，圖 16-5。

圖 12 上海博物館藏，王莉英編，《中國陶瓷全集》明，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頁 144，圖 146。

圖 13 Oliver Watson, *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Kuwait National Museum*,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4, p. 491, Cat. W. 4.

圖 14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纂，《故宮藏瓷 明青花瓷四》（香港：開發股份有限公司，1963），圖版 3c.

圖 15 John Carswell, *Blue and White: Chinese Porcelain Around the World*, London: British Museum, 2000, p. 139, pl.160a.

圖 16 陳育寧、湯曉芳編著，《中國回族文物》，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8，頁 149。

圖 17 2011 年 9 月筆者自攝。

圖 18 Jessica Harrison-Hall, *Ming Ceramics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2001, p. 199, pl 8-11.

圖 19 耿寶昌主編，《青花釉裏紅》（中），香港：商務印書館，2000，頁 58，圖 53。

圖 20 Jessica Harrison-Hall, *Ming Ceramics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2001, p. 196, pl 8-7.

圖 21 Margaret Medley, *Oriental Ceramics, the World's Great Collections vol. 6.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London*, Tokyo, New York and San Francisco: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80-1981, pl.125.

圖 22 佐藤サアラ，〈正德アラビア文字裝飾青花に關する一考察〉，《東洋陶磁》，32，2003，頁 94。

圖 23 Josephine H. Knapp, Esin Atil ; Introduction, John A. Pope, *Oriental Ceramics, the World's Great Collections vol. 9.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 C*, Tokyo, New York and San Francisco: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80-1981, pl. 110.

圖 24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江西景德鎮明清御窯遺址發掘簡報〉，《文物》，2007 年 5 期，頁 25，圖 76。

圖 25 Regina Krahl,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A Complete Catalogue Ⅱ Yuan and Ming Dynasty*, New York: Sotheby's Publications, Harper and Row, 1986, p. 445, pl.780.

圖 26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江西景德鎮明清御窯遺址發掘簡報〉，《文物》，2007 年 5 期，頁 36，圖 140。

圖 27 Jessica Harrison-Hall, *Ming Ceramics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2001, p. 198, pl 8-10.

圖 28 2011 年 9 月筆者自攝。

圖 29 吳東閣，〈南陽發現明代伊斯蘭文物〉，《中國穆斯林》，1994 年 4 期，頁 25。

圖 30 Regina Krahl,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A Complete Catalogue Ⅱ Yuan and Ming Dynasty,* New York: Sotheby's Publications, Harper and Row, 1986, p. 444, pl. 778.

圖 31 Regina Krahl,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A Complete Catalogue Ⅱ Yuan and Ming Dynasty*, New York: Sotheby's Publications, Harper and Row, 1986, p. 579, pl. 777.

圖 32a Oliver Watson, *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Kuwait National Museum*,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4, p. 488, Cat.W.3.

圖 32b Oliver Watson, *Ceramics from Islamic Lands-Kuwait Nat:onal Muswum*,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4, p. 489, Cat. W. 3.

圖 33 馮明珠．索文清主編，《聖地西藏——最接近天空的寶藏》，臺北：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2010，頁 197，圖 101。

圖 34 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臺北：鴻禧美術館，1998，頁 79，圖 75。

圖 35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編號故瓷 13749。

圖 36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編號故瓷 9711。

圖 37 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中央博物院共同理事會編纂，《故宮藏瓷 明釉裏紅瓷》，香港：開發股份有限公司，1963，圖版 3a.

圖 38 中國建築藝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路秉杰主編，《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伊斯蘭教建築》，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3，頁 79，圖 98。

圖 39 中國建築藝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路秉杰主編，《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伊斯蘭教建築》，

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3，頁 49，圖 66。

圖 40　中國建築藝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路秉杰主編，《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伊斯蘭教建築》，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3，頁 32，圖 44。

圖 41　葛曉康，〈南京牛首山弘覺寺鄭和德塔考證——兼考「三保」與「三寶」太監〉，《中國歷史文物》，2008 年 3 期，頁 27，圖版三。

圖 42　耿寶昌，《明清瓷器鑑定》，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3，頁 81。

圖 43　耿寶昌主編，《青花釉裡紅》（中），香港：商務印書館，2000，頁 67，圖 62。

圖 44　耿寶昌主編，《青花釉裡紅》（中），香港：商務印書館，2000，頁 60，圖 55。

圖 45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編號中畫 317。

圖 46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編號中畫 316。

圖 47　《中國繪畫全集》第 12 卷明 3，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頁 139，圖 136。

圖 48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編號故瓷 8485。

圖 49　2011 年 9 月筆者自攝。

圖 50　靜嘉堂文庫美術館編，《靜嘉堂藏吳州赤繪名品圖錄》，東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1997），頁 38，圖 30。

圖 51　靜嘉堂文庫美術館編，《靜嘉堂藏吳州赤繪名品圖錄》，東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1997，頁 49，圖 44。

圖 52　相賀徹夫編輯《世界陶磁全集》第十四卷，東京：小學館，1989，頁 172，圖 176。

圖 53　川床睦夫監修、Miho 博物館編輯《エジプトのイスラーム文様展圖錄》，京都：Miho 博物館，2003，頁 49，圖 58。

圖 54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編號故瓷 16262。

圖 55　杉村棟編輯，《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 17 イスラーム》，東京：小學館，1999，頁 270，圖版 156。

圖1　青花波斯文燭台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2　青花阿拉伯文番蓮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青花阿拉伯文蓋硯　法國吉美博物館藏　2011年9月筆者自攝

圖4　青花阿拉伯文碗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5　青花波斯文蓮花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6-a 明正德描紅回文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6-b 明正德描紅回文盤　另面

圖7-a 明正德描紅回文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7-b 明正德描紅回文盤　另面

圖8-a 明正德描紅回文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8-b 明正德描紅回文盤　另面

圖9-a 明正德描紅回文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b 明正德描紅回文盤　另面

圖10-a 明正德描紅回文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0-b 明正德描紅回文盤　另面

圖11-a 明正德描紅回文盤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11-b 明正德描紅回文盤　另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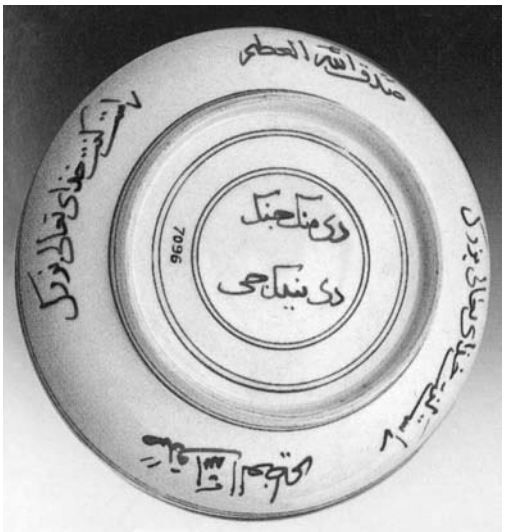


圖12-a 明正德描紅回文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2-b 明正德描紅回文盤　另面

圖13-a 明正德描紅回文盤　科威特博物館藏

圖13-b 明正德描紅回文盤　另面

圖14 青花阿拉伯文梅花圓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5 青花阿拉伯文盤　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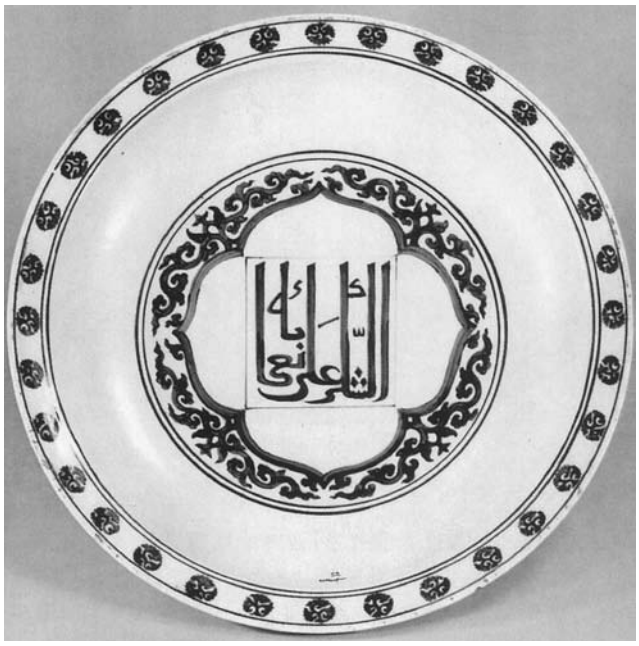


圖16　青花阿拉伯文大盤　德黑蘭考古博物館藏

圖18　青花阿拉伯文三足香爐　大英博物館藏

圖20　青花阿拉伯文圓盒　大英博物館藏

圖17　青花波斯文三足香爐　香港天民樓藏
2011年9月筆者自攝

圖19　青花阿拉伯文圓盒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21　青花回字紋硯屏　英國大衛德基金會舊藏
現藏大英博物館

圖22 青花阿拉伯文長頸瓶　英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藏

圖23 青花阿拉伯文碗　華盛頓佛利爾美術館藏

圖24 青花方盆殘片　景德鎮明清御窯廠正德地層出土

圖25 青花文字紋碗　土耳其砲門宮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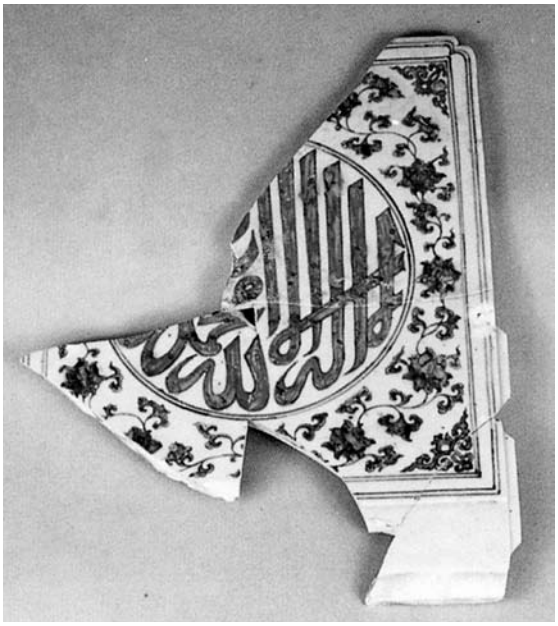


圖26 青花欄板殘片　珠山遺址正德地層出土

圖27 青花波斯文方瓶　大英博物館藏

圖28 青花波斯文筆架　香港藝術館藏　2011年9月筆者自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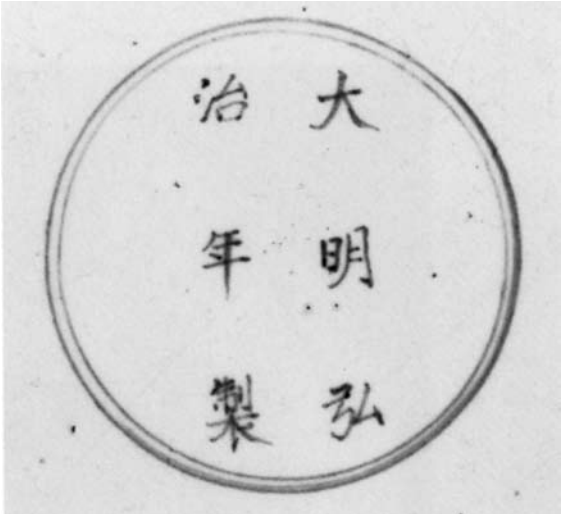
圖29 阿拉伯文銅爐與阿拉伯文銅瓶　明代南陽府衙舊址出土

圖30-a 青花龍唐草文字紋碗　土耳其砲門宮藏

圖30-b 青花龍唐草文字紋碗　款識

圖31 「大明宣德年造」款　青花阿拉伯文盤
土耳其砲門宮藏

圖32-a 青花阿拉伯文盤　科威特博物館藏



32-b　青花阿拉伯文盤款識

圖33　銅鎏金轉經輪　拉薩西藏博物館藏

圖34　宣德鬥彩藏文鴛鴦蓮池紋盤　宣德地層出土
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

圖35　明　成化窯　青花梵文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6　明　弘治　青花梵文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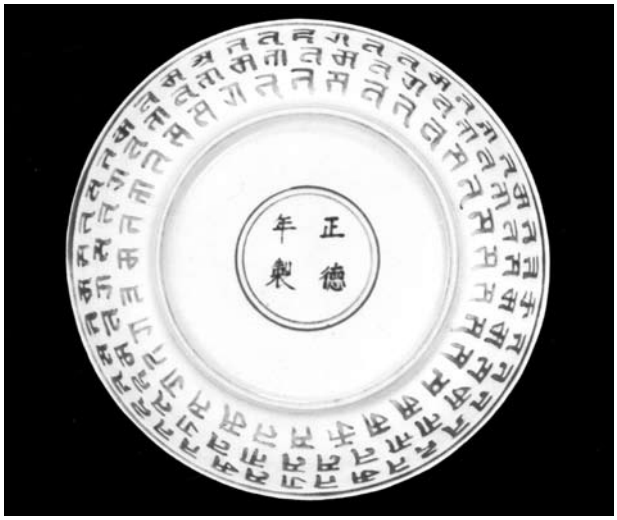


圖37　正德紅彩梵文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8　青海湟中洪水泉清真寺大殿正面

圖39　河南沁陽清真寺大門外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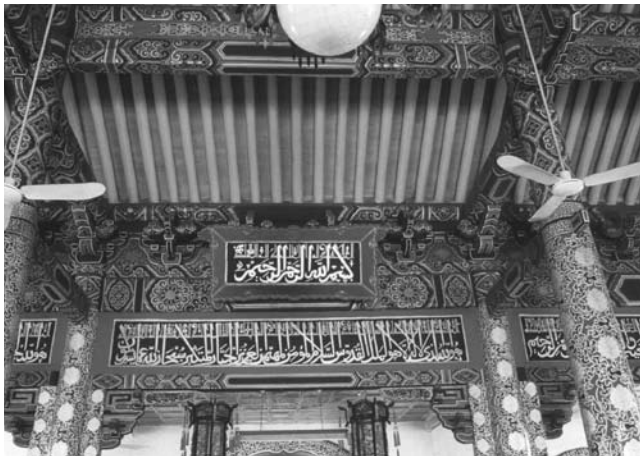


圖40　北京東四清真寺大殿內檐裝修

圖41　明宣德盒瓶罐三設　南京牛首山弘覺寺塔地宮出土

圖42-a　天順年香爐　山西省文物商店藏

圖42-b　天順年香爐　底款「天順七年大同馬」

圖43-a 青花穿花龍紋碗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43-b 青花穿花龍紋碗底款書八思巴文書「正德年製」款識

圖44 青花正德丁卯字爐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45 明武宗畫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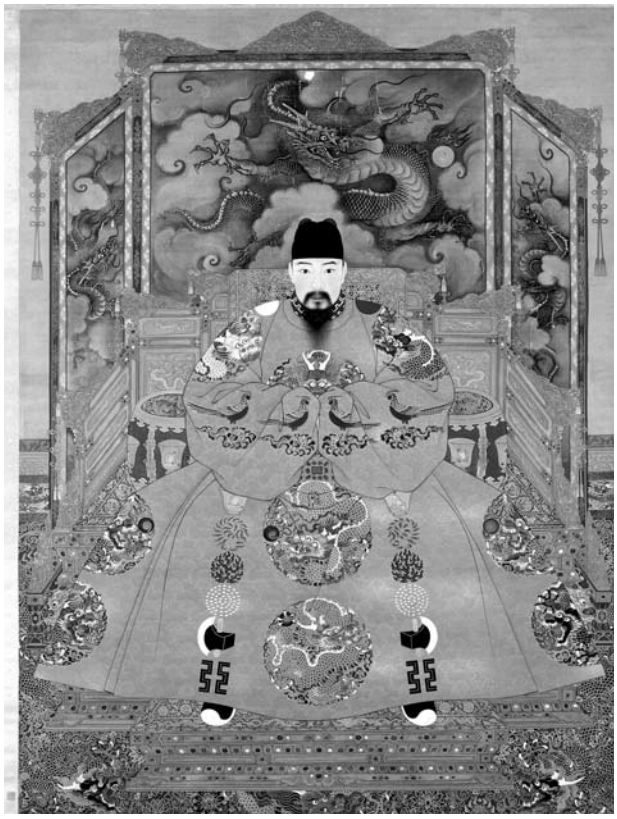


圖46 明孝宗肖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7　朱端　烟江晚眺圖　軸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49　青花波斯文六角燭台　法國吉美博物館藏
2011年9月筆者自攝

圖50　五彩人物「忠孝廉節」文盤　靜嘉堂文庫美術館藏

圖48　青花阿拉伯文番蓮七孔花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1　五彩方位「天下一」帆船魚紋盤　靜嘉堂文庫美術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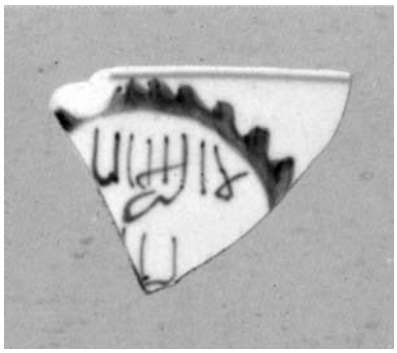


圖52　青花殘片　埃及福斯塔特出土

圖53　青花山水文字紋碗　明末

圖54　明　嘉靖　五彩八仙慶壽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5　樹下遊樂圖　帖木耳朝　1425-1450左右　伊朗或中亞製作　絹畫
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